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1942年4月初至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奉调回延安工作的途中,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检查指导山东的工作。刘少奇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原则性,果断地处理了山东存在的问题,使困难时期的山东形势迅速发生了转折,推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亲自指导山东抗日军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充分发动各阶层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详见《刘少奇在山东根据地指导“双减”工作侧记》。

抗战时期,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仇敌愾,纷纷投入到保家卫国、驱逐日寇的红色浪潮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但在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同时,一些意志薄弱,经不起物欲诱惑的民族败类,却助纣为虐,成为叛徒,当起了汉奸。被罗荣桓怒斥为“一条疯狗”的原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协理员(团级)罗保成,就是我军可耻的叛徒之一。1942年11月,罗荣桓发起海陵反“扫荡”、反“蚕食”战斗,一举将其抓获,经公审后就地正法。详见《罗荣桓打“狗”》。

日寇侵华期间,两淮盐区赋务受挫,盐产遭掠,灶民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两淮盐区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反日抗日,维护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日寇占领两淮盐区后,两淮盐区南有新四军,北有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屡屡挫败日寇,还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及管理的淮盐产区,不

使黄海盐产之利尽落敌寇之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与日寇的凶残暴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日寇掠夺淮盐行径予以很大牵制和有力回击。详见《两淮盐区抗日记忆》。

西游故事对于国人来说可谓妇孺皆知,其核心线索原本是唐僧由长安出发的西天取经路,作者却用大量的笔墨铺陈海州的掌故和风物:海上花果山、灌口杨二郎、沙河口、黄风洞、平顶山、玉女峰、大仙庵、人参果、清风明月、金银二妖、七十二洞……书中7次写到唐僧的籍贯,次次认定海州。《西游记》里的海州方言更举不胜举。许多读过《西游记》、登过花果山的观光客叹为观止:连云港不愧为《西游记》文化的发祥地!在这样一座真山真水、原汁原味的《西游记》背景地构筑“西游城”,堪称百利而少弊!详见《〈西游记〉与西游城——中华经典的呵护与彰显》。

清代文学巨匠李汝珍的古典名著《镜花缘》,展示的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生活,特别是海属地区乾嘉年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当时社会大背景和地方小环境相融合的产物,极具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而与小说《镜花缘》相关的这些传说故事,都与名著《镜花缘》的作者所生活的地域民俗风物密切联系,每一个传说故事都是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与心杰的反映,幽默的意趣、睿智的哲理、朴实的语言等艺术之光随处可见,浓郁的海州地方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详见《〈镜花缘〉传说:一部奇书产生的土壤》。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婵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朱荣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陈毅敏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骏鹏

目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

- 04 刘少奇在山东根据地指导“双减”工作侧记 / 葛华
07 罗荣桓打“狗” / 王晓华
09 两淮盐区抗日记忆 / 胡可明
12 抗战初期首炸日军军火专列的爱国学者汪德熙 / 李思慧
13 竹麻县抗日烈士张涛 / 祝新华 张作松
15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六) / 本刊编辑部

地方文化研究

- 19 《西游记》与西游城
——中华经典的呵护与彰显 / 李洪甫
23 《镜花缘》传说:一部奇书产生的土壤 / 崔月明 刘兆元
27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三) / 刘凤桂

史海钩沉

- 30 沈云沛、袁世凯与清末邮传部 / 刘成文

郁洲溯源

- 33 王规祖孙在朱麻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二
/ 伏广喜 同祥富 杨庆昌

往事追忆

- 36 报社生活琐忆 / 韩世泳



录

40 国地税分设亲历记 / 殷 然

风物览胜

43 雾崖石城 / 胡维仁

附录

46 《连云港史志》2015 年总目录 / 本刊编辑部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血战连云

——连云港抗战石刻精选



好消息!

成功关注“连云港史志”微信获赠 2016 全年连云港史志
“了解港城历史的窗口”,欢迎您关注连云港史志官方微信!
(查找公众号“连云港史志”或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加关注)

成功添加关注,阅读点赞,截屏图片发 lyshitan@163.com, 注明通联地址,可免费获赠 2016 全年连云港史志内刊。

本刊编辑部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编:222006

网址: www.lysz.gov.cn

电子邮箱: LYshitan@163.com

电话: (0518) 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2015 年 12 月

2015 年第 6 期总第 102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刘少奇在山东根据地 指导“双减”工作侧记

葛 华



1942年4月，刘少奇在西朱范村，与山东分局等机关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肖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长胜、陈光、梁兴初、杜明

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亲自指导山东抗日军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充分发动各阶层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战时期的土地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号召停止内战，

1942年4月初至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奉调回延安工作的途中，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化名胡服，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检查指导山东的工作。

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后，立即深入调查研究，很快就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原则性，果断地处理了山东存在的问题，使困难时期的山东形势迅速发生了转折，推动

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党工作重点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同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只要反对日本侵略，保卫民族独立，都在统战范围。在此情况下，党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这一新的土



地政策。1937年8月下旬,这一极其重要的土地政策被写进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1939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又提出了“必需实行减租减息”这一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政策。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里明确规定:“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根据这一政策规定,各抗日根据地都分别制定了具体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把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各地都从实际出发,分别制定实施条例,或实行“三七”分租(地主三成,农民七成)、二五减租(原交一担的,减去二斗五升),或由对半分租改为三五、六五分租(地主三五,农民六五),由三七分租改为二五、七五分租(地主二五,农民七五)和分半减息政策。在劳动问题上,提出为雇农“增加工资,改钱换粮”的口号,并限定劳动时间,规定工资标准等。

刘少奇亲自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在驻华中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第13团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下,风尘仆仆到达中共山东分局、115师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今属东海县)。刘少奇肩负中央重任,一进入山东境内,即不顾旅途疲劳,立即深

入群众调查访问,了解抗日群众组织发展、减租减息、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阶级关系等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严肃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明确地提出了今后斗争的主要任务。

在关于减租减息(以下简称为“双减”)发动群众的问题上,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山东分局的主要领导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分局委员、115师政委罗荣桓主张,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轰轰烈烈的“双减”运动,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分局书记朱瑞则认为,首先把妇女和青年组织发动起来,农民运动和“双减”也就好搞了。由于分局内部意见分歧,“双减”这一重要工作流于形式,就是政府颁布的一些有关政策法规,也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因此,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摆脱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得不到改善,抗战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群众与我党、我军的关系也得不到巩固。

刘少奇同志要求山东应把“双减”“增资”这一解决群众吃饭、生存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说:“我看,就是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双减’运动。通过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就跟着起来了。”他在《关于群众运动》的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强调群众是党的母亲,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脱离大地一样,必然失败。他对山东过去没有认真进行“双减”,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把“双减”作为当前中心工作,要全党来抓,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来做。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山东分局于1942年5月4日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从麦收到年底,把这项工作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抓好。第115师师部指示各部队,积极配合地方搞好“双减”,武装保卫夏收。根据分局统一部署,第115师帮助鲁南、滨海等3个区进行“双减”试点。分局书记朱瑞和分局委员、山东纵队政委、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分别到莒南、沂南指导试点。于是“双减”这一运动在山东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双减”的政策是：一方面规定地主实行“双减”，地租：以抗战前租额减低 25% 为原则；利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雇工待遇：工资（粮食）一般增至 400~500 斤，最高 500 斤，最低 300 斤，女工最低 200 斤，童工最低 100 斤。另一方面，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经过努力，“双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接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颁布了《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租田暂行条例》《借贷暂行条例》等政策法规，使“双减”和“双增”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理有据。

1942 年 6 月 17 日，少奇同志和 115 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一同来到滨海区赣榆县黑林乡大树村。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地方上的减租减息和群众生活，刚刚住下，就把在大树村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的滨海地委工作团团长孙汉卿叫来，要他详细汇报大树村“双减”工作情况。后来又把贫雇农积极分子熊方文请来，亲自做动员工作。在农民熊方朋的家里，刘少奇同志以安源煤矿工人团结斗争取得罢工胜利的事例，启发大家的觉悟，他形象地拿起桌子上的筷子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在刘少奇的启发引导下，大树村的贫雇农很快就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端午节后的第二天晚上，工会组织 70 多名雇工，高呼“实行减租减息，要求增加工资”的口号，涌进地主熊老七的大院，进行说理斗争。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压力下，熊老七接受了工会提出的条件，第二天就和雇工签订了减租减息合同，每人增加工资粮 450 斤，白布 1.2 丈。工作团在刘少奇同志亲自指导下，斗倒了熊老七，攻破了大树村的封建堡垒。随后，附近村庄的“双减”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刘少奇在赣榆大树村住过的房子

来。

减租减息后，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初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群众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村中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同时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来说，减租减息不是没收土地，不给生活出路，而是根据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租佃双方说理协商，合理地减轻剥削、减轻负担。在团结抗战的大局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团结战斗的新景象。

1942 年 7 月下旬，刘少奇同志圆满地结束了在山东的工作，启程赴延安。刘少奇同志的山东之行，对于山东抗日军民胜利度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推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对山东工作成绩实事求是地肯定，对缺点错误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减租减息工作的亲自具体的指导，都令大家心悦诚服，不能忘怀。

（作者单位：赣榆区史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罗荣桓打“狗”

王晓华

抗战时期，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惜抛家弃业，别妻离子，纷纷投入到保家卫国，驱逐日寇的红色浪潮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在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同时，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物欲诱惑的败坏分子，却助纣为虐，成为叛徒，做起了汉奸，充当起民族败类的角色。被罗荣桓怒斥为“一条疯狗”的原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协理员（团级）罗保成，就是我军可耻的叛徒之一。1942年11月，罗荣桓发起海陵反“扫荡”、反“蚕食”战斗，一举将其抓获，经公审后就地正法，其投敌卖国的罪恶行径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罗保成是在王凤鸣的教唆诱惑下叛变革命，走上与人民为敌的可耻道路的。

王凤鸣，原名王洪鸣、王宏鸣，福建长汀人。14岁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参加讨长征和平型关战役。红军时期因作战勇敢、为人机敏，相继担任讨115师政治部青年干事、684团政治部主任。115师挺进山东后，王凤鸣担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同时还兼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大权独揽，骄横跋扈。所部活动在以山东单县为中心的微山湖西部地区。

1939年秋，受康生和王明从苏联带回来的“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简称“肃托”，意指铲除共产党内部的汉奸特务）的影响，在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的支持下，王凤鸣借机打击铲除政治对手，在湖

西抗日根据地掀起“肃托”浊浪。“二王”采取肉刑逼供等残忍手段，无辜逮捕滥杀我党政军干部300多人，关押600余人，致使多年艰苦经营起来的湖西抗日根据地成果丧失殆尽。危急时刻，在罗荣桓的及时干预处理下才最终停止。

这一惨案，震惊中央，影响全国。1941年2月20日，中央正式做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王凤鸣受暗害分子王须仁利用，假冒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115师的制止，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消息传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时，正值115师在山东临沭县蛟龙湾举行庆祝我军建军十四周年紀念大会。其间，罗荣桓将中央的决定告知王凤鸣，希望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罪孽深重的王凤鸣自知政治生命就此结束，前途不保，在看押期间，趁机逃跑到日伪大本营赣榆县城，投敌成了汉奸。为逃避打击，王凤鸣随舅舅姓，改姓杨，名步仁。起初在汪伪71旅李亚藩部担任121团2营营长、团长。之后，王凤鸣又向日伪申请了一个特别番号“阜协军别动队”，自任别动队司令，共5个大队1200余人。

为讨好日伪，王凤鸣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替主子卖命，频繁在赣榆、海陵一带伏击、袭扰、“蚕食”我根据地，残杀抗日军民，抢劫群众财产，破坏民主体制，成为插在滨海根据地的一颗毒钉，对根据地的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不止于此，王凤鸣还通讨特务手段，以优裕的



物质条件和封官许愿拉拢策动我党政军干部中的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3营营长许林甫、原团青年干事易存明、军医肖达仁、排长施长浩、敌工干事王青山、旅部侦察股长徐定符、原57军独立旅副旅长李振东、独立旅2团团长张光,曾任海陵县参议员的赵霄轩等少数民族败类,经不住王凤鸣的引诱和恐吓相继叛变投敌。时任115师政治部协理员的罗保成,就是其中级别较高的变节者之一。

罗保成原是国民党兵,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在红军中受训教育。但他在旧军队养成的偷奸耍滑、阳奉阴违的旧习气一直不改。提拔后,他经常利用下部队检查的机会,要吃要喝,不按他的意思办,就会打小报告,说坏话,在基层部队影响很坏。战地记者白刃曾描述罗保成:“打仗时‘发洋财’,平时吃吃喝喝,问他钱从哪儿来?总说是红军时分的伙食尾子,剩下的五块大洋。五块钱老是用不完,因此有‘老五块’的诨号。此人年过三十,身体瘦长,佝偻腰,驴马面,老鼠眼。”

罗保成试图勾结奸细队理发员,事发后,党支部要开斗争会批评他。罗保成自知不保,仓皇投奔至王凤鸣处,做起了汉奸。被王凤鸣委以重任,担任海陵县横沟据点的别动队大队长。

为拔除王凤鸣、罗保成之流毒瘤,铲除叛徒,消除隐患,115师决定发起海陵反“蚕食”战斗。

1942年11月3日,按照罗荣桓、陈光、陈十桢研究部署,在115师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的组织指挥下,教导2旅第4、6团、第57军独立旅第1团第2营和海陵地方武装利用夜色掩护,向盘踞在海陵各地的日伪据点发起猛烈攻势。短短五天,罗庄、横沟、兴庄岭、小齐庄、荷庄湖、顶望、小中、卜林等16个据点被我军悉数攻克,收复罗庄以东羽东、东安、河南、白河4个区,毙伤、俘虏日伪军近千人,取得海陵反“蚕食”大捷。

在此次战斗中,龟缩在横沟据点的罗保成手下200余名伪军被全歼。第二天,从狗洞出逃的罗保成在亭子埠被群众抓获,交由独立旅处理。

11月中旬,师直属队召开祝捷、公审大会。会址选在海陵县城北15公里外的临沭县大兴镇高

埠村东南的一个大场院里举行。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十桢等领导干部及数千名军民参加大会。

公审大会这天,天气晴朗。当叛徒、民族败类罗保成、易存明由执行人员押上会场时,数千军民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光荣,卖国可耻!”的口号此起彼伏,震响天宇。

在我军攻打横沟据点时,罗保成在反抗中眼部负伤。我军以人道主义精神,给他做了包扎处理。见到罗荣桓、陈光时,罗保成痛哭流涕,卑贱地乞求给他留一条生路。罗荣桓愤怒地斥责他为“狗!一条疯狗!”

临时组成的军事法庭对罗保成的罪状进行了宣判。罗保成一一认罪。当宣判其罪大恶极,立即执行死刑时,他竟全身瘫软在地,面如死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最后被两名行刑人员架起胳膊拖出会场,执行了枪决。落得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可耻下场。

罗保成被枪毙后,罗荣桓作了重要讲话:“我们今天是庆祝反‘蚕食’战役胜利大会,是祝捷大会,也是一个公审大会,公审枪毙了叛徒、民族败类罗保成。我们今后还会开展这样的打‘狗’运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领土,占我国家,用卑劣至极的手段,拉拢、诱骗、恐吓一些意志薄弱者,驱使他们成为汉奸走狗、叛徒,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为敌、与人民军队为敌,妄图消灭我八路军、游击队和摧毁我们的根据地。他们的罪恶图谋是永远不可能得逞的,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更加鼓舞斗志,坚定胜利信心,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狠狠打击敌伪、汉奸、走狗的破坏活动,渡讨难关争取胜利!”

事后,战地记者白刃以《狗》为题,撰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1942年11月份的《战十报》上。木刻家那淑怀专门刻了一个狗头作为插图。

(作者单位:东海县南开区管委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两淮盐区抗日记忆

胡可明

日寇侵华期间两淮盐区赋税受挫，盐产遭掠，灶民处于腥风血雨之中。两淮盐区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反日抗日，维护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盐不资敌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淮南盐区陷落。1939年3月，日寇侵占了当时国民政府江苏省东海行政专署——海州。3月5日，日寇在海州举行了入城式，次日又举行入城阅兵式，整个淮盐产区尽陷敌手。是时，两淮盐区之重心早由淮南转到了淮北。淮北自建成济南盐场后，仅济南一场之盐即超过当时全淮南盐区，全淮北产量占两淮总产的90%，有的年份如1924年淮北盐产量达全国的1/5。

日寇觊觎两淮盐区，尤其是淮北盐区，由来已久。他们深知，日本虽是个岛国，四面环海，但能晒制海盐的海岸滩涂并不多，其地下矿盐资源尚无探明及开采，本国所产之盐连国人食用皆嫌不足，更不说其大力发展的用盐作原料的盐化工业。1936年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一次重要的会议纪要中写道：“鉴于碱及其他化学工业用盐之需，将达179万吨左右，其中八成之供给由外地及邻邦设法保证。”军国主义本性必向霸权主义发展，本国盐品不敷需要，也不会去做和平的国际贸易来获取，而是要靠残酷的战争手段来野蛮地掠夺他国的盐资源。日本不会忘记，早在1919年就有盐商隆昌号

购运淮北济南场盐100万担输销日本。淮盐量大质优，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对之馋涎欲滴的肥肉，必欲夺之占之贪之而后快。现保存在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的日本国际情报社当时出版的第十八卷第五号《国际写真情报》画报中，有一篇题为《日军占领海州之意义》的文中露骨表白：“……至于海州（注：指淮北盐区）盐尤为有名，此地之盐产，始于唐代，……此处之盐向归国府统治专卖，……仅在民国六年（注：实为民国八年），入讨一次日本。”为了占领海州，掠夺淮盐及其他物资，日寇动用大批兵力，共分五路同步进攻。

为了阻止日寇占领淮盐区，并在日寇占领后阻碍其掠夺淮盐，国民党政府、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广大灶民与其他各阶层人民一道，在两淮盐区上演一幕幕反日抗日历史剧。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两淮盐务管理局官员，出于爱国之心、民族气节，在积极筹措局机关西撤河南同时，想方设法大量抢运淮盐去内地。长江水道被日寇封锁后，致淮盐销区湘、鄂、皖盐源断绝，人民无盐可食，而淮盐存量尚巨，国民党两淮盐务管理局发动各盐场所有人力、物力，通过各种运输通道，大量内移盐斤，共运出淮盐400万担，其中大部分到达了开封、蚌埠、徐州、信阳、汉口等地，对维持各地民食军需，起了很大作用。1937年12月17日，日寇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抗战命令，两淮盐务管理局遂将其所属盐税警察改编为第



八军,下设六个纵队,开辟海州云台山(注:今连云港云台山)布防,以抵御日寇侵占淮北盐区。当时,淮北产盐区尚有存盐一千多万担,国民党两淮盐务管理局继续设法向内地抢运,但可惜只抢运了12万担。1938年9月,日寇封锁了连云港、陈家港海面,满载淮盐的“时和号”“安康号”“华顺号”三艘货船,来不及驶出,国民党盐务总署电令:卸盐于岸,沉船于燕尾港,阻挡日寇舰艇登陆。堆存在廩的盐斤,也按盐务总署电令抛河抛海,不让日寇抢得(此事在前述之日本画报中亦有述之)。日寇攻陷海州后,在淮北的两淮盐警总队队长胡文臣率领盐警官兵奋力对阵日寇,保盐区保盐产,后在宿迁战死,为国捐躯。

发展淮盐

日寇占领两淮盐区那几年,日子并不好过,尽数掠夺淮盐的企图并未完全得逞。当时两淮盐区南有新四军,北有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屡屡打败日寇,还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及管理的淮盐产区,不使黄海盐产之利尽落敌寇之囊。

1940年,淮南盐区灶民自动推选代表,许保之、邱学诗、陈延伯、秦致和、赵振桐等几十人,代表一万多灶民,向抗日民主政府请愿,要求打击日寇,清剿散匪,收复盐区,恢复淮盐生产,保民生活。当年10月,新四军第三纵队两个团就挥师东进,于次月即在淮南盐区的柘港建立了“江苏省第四区盐务处”,接管原国民党丰振、余中盐场公署,稳定煎盐生产,安抚灶民生活,并开征盐税,为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活动筹集资金。

1941年1月,鉴于原国民党政府之两淮盐务管理局已于1938年撤去河南后又移汉口,不可能再行使管理战争中的两淮盐务职能,即在东台县境内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所属的两淮盐务管理局,统一管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盐务工作,一是打掉不良垣童对灶民的人身压迫,使其从盐奴状态下解放出来;二是适当提高盐的收购价格,盐值提高了四倍,灶民生活有了保障;三是终止灶头百长制,废除过去存在的中间剥削,使盐利掌握在抗日民主政府手中,用以资助抗战,也保护着淮南盐区免遭日寇铁蹄践踏。这些措施提高了灶民、爱国商人发展

盐业生产和开展销售活动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民主政府实行就场征税。当时就有煎盐灶民32000余人,1181副盐灶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淮南盐区淮盐生产和销售搞得红红火火。为更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淮南盐区的淮盐产销,更加有力地支持、资助抗战,1942年3月,苏中四分区税务管理机关举办知识青年培训班2期,共培训120人,分配到盐场工作,加强盐场工作力量。还对税务管理的一些基本工作流程,如税票样式、填写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新四军还开辟海上运输线,组建由煎盐灶民、渔民出身的战士组成的苏中军区海防团,来保护海上运输淮盐。

1943年春荒时节,苏中抗日民主政府向贫困煎盐灶民发放赈济口粮,帮助度荒。同时,发放贷款,资助灶民恢复煎盐生产进行自救。仅在如皋就一年拨给煎盐用草81万斤充为草贷。东台地区发粮贷40000担。用以工代赈方式,组织煎盐灶民和其他百姓,加固范公堤,抵御海潮对盐灶的毁损和对灶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由于措施得法,抗日民主政府号召深入人心,当年6月底,苏中四分区征得上半年盐税款447万元,对苏中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力量总是可以默契配合、遥相呼应的。淮南盐区有新四军在保卫淮盐,淮北盐区则有八路军在兴建淮盐,都是为了发展淮盐,这对坚持持久战,抗击日寇,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意义十分重大。1940年11月30日,几乎在新四军进入淮南盐区同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山东纵队二旅在王接庄宣布赣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控制管辖了赣榆北部的柘汪、海头、九里等盐场。此后,八路军东进支队的6团和26团在支队长肖华的率领下,在柘汪新建了12份晒盐池滩,山东军区后勤部和滨海军分区又新建盐田400亩,东北军111师333旅孙明杰旅长也率官兵到柘汪开辟了“万利”盐滩,扩大了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所控制的盐场。1942年8月成立了青口盐务署,统一领导鲁南苏北解放区的盐业生产运销、盐税征收和盐务行政管理,使当地的淮盐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力保障了山东解放区的军需和民食,支援了山东抗战。



保盐夺盐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府,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日寇掠夺淮盐予以很大牵制和有力回击。

就在日寇全部侵占两淮盐区当年农历十月十六(1939年8月30日),淮北盐区遭受了特大海啸的袭击,房屋大部倒塌,淹死灶民1600余人,盐斤损失巨量,盐池尽毁成平地,生产工具飘落无踪,灶民失家失业,生活无以为继。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政府根本不予讨问,灶民大批外逃谋生,有的就逃到了苏中解放区。新四军3师和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善用这批灶民的晒盐技能,先由济南场逃来的老灶民顾开金等人,为裕华公司铺筑了两份盐滩,当年产盐2千担。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发展生产(淮盐)、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裕隆、裕民、裕成、裕丰、裕淮、裕源等公司因此争相来此投资,建造盐滩生产淮盐,场区人口一下子增加到3200人,逃来的淮北灶民都得到了安置。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安置淮北灶民,并让他们用自己之产盐所长多产淮盐,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淮盐生产,解放区产盐数量猛增,1945年新开辟的这部分盐滩产盐4939.5万斤。相比之下,敌占区的淮北盐区,年产量却锐减。

日寇1938年3月占领淮南盐区后,由梁鸿志等汉奸组成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于当年9月30日,以其伪财政部名义公布了《私盐充公充赏及处置办法》13条,不承认非敌占区盐产为合法盐产,阻挠非敌占区盐业生产及销售,压制和扼杀反日抗日力量的一切盐业生产经营活动,意欲控制全国盐产为日所用。针对日伪沆瀣一气、辱我中华、夺我淮盐种种暴行丑行,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抗战支队政工队,派出海滨工作队深入如皋一带盐区,宣传抗日,组织煎盐灶民成立“盐抗会”,建立起“如皋盐民自卫队”保家护盐。1941年,淮北盐区济南场大源公司灶民孙友、卢有弟、朱保林等人,还组织灶民弃滩罢工,不为日寇产盐。淮北盐区板浦场灶民姚子贵,对日寇在盐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当日寇监工来欺负他时,他用推盐车的车轱辘抽了监工。同是板浦场灶民的刘二,还把欺负他老婆的

日寇曹长武久夫杀死埋掉。板浦场另一灶民孙广胜,盛怒之下杀死无端欺凌他的日寇小队长,扔进了大海,叫鬼子们寻尸不得。

为了粉碎汉奸政府《私盐充公充赏及处置办法》,击溃日寇掠夺我全部淮盐的野心,伴随着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脚步,两淮盐区由原来的巩固好发展好所控制区域的淮盐生产,并有所扩充解放区盐滩,转向敌占区销售淮盐夺取盐利,直至直接夺取被敌控制的淮盐。1944年,新四军3师副师长张爱萍指挥8旅首次解放淮北盐区重镇陈家港,全歼守敌,生俘伪税警团第四大队大队长王寿昌、第七大队大队长郭克勤及其以下官兵435名,缴获迫击炮等轻重武器及弹药若干,特别是夺得淮盐48万担,尽数运回解放区,这对驻守淮北盐区的敌伪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1945年1月,抗日战争夺取全面胜利的曙光在即,为了取得急需的大笔资金来支援与日寇的最后决战,苏中四分区即通过爱国商人将淮盐中的大籽盐运往敌占区销售,获得盐款伪币8千万元。控制了赣榆县境内淮北盐区的我抗日民主政府利用日军食盐短缺的机会,以“鼓励输出、限制进口、掌握外汇、巩固本币”的方针,通过爱国商人,出口淮盐约94万担。与此同时,华中财委会作出《食盐管制运销问题的决定》,强化非敌占区食盐的产运销,最大限度地发挥淮南盐区所产淮盐对抗日战争的资助能效,为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我华中部队12纵86团奉命接收淮北盐场,部队以急行军速度,迅速接收了济南场的全部和中正场东半场,淮北盐区的西部虽被国民党接收且两党为此还有摩擦,但毕竟是保住了淮盐不被穷途末路的日寇所毁灭。

(作者单位: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抗战初期首炸日军军火专列的 爱国学者汪德熙

李思慧



青年时代的汪德熙

1938年，日军为了运送屠杀中国军民的枪炮弹药，利用铁道线上的专列横行无忌。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计划炸毁日军控制的平汉铁道线。不久，八路军得到情报，9月的一天，将有一列日本侵略军的军火专列进入北平往汉口的铁道线。

八路军成立了两个爆破组。其中一组由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汪德熙负责。

在装满军火的列车出行之前，日军都会派巡逻车在前面探测，发现路上或路旁有异常，就会立刻向行驶在后面的军列报警并排除险情。所以，光靠事先埋炸药爆破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人工控制起爆，才能准确地炸毁军列的要害。于是，经过实地考察，汪德熙选择了路上的一根铁轨，伺机埋上了12个炸药筒，并把电线牵引到了200米以外的玉米地里，连接起爆装置，布置好伪装，并埋伏等候。

夜色弥漫在平汉路上，日军的巡逻车开了过去。没过多久，一条黑乎乎的身影顺着铁轨慢慢地爬了过来。隐蔽在铁道一侧玉米地里的汪德熙看到军列接近炸药筒时，果断地按下电闸。随着一声巨响，列车脱离了轨道，扭曲的身体踉踉跄跄、东倒西歪——爆破组引爆成功。汪德熙为这一爆破技术在解放区的研制和应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种定时可控的引爆装置以及火药的配制在当时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技术。冀中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组织通过清华大学的教授、汪德熙的导师叶企孙联系上这位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热血青年。

叶企孙让汪德熙以传教士的身份作掩护，进入解放区，研制爆破材料并筹集相关的设备。

刚到冀中根据地的时候，汪德熙看到被称作“实验室”的房子里的设施极其简陋，充满信心而来的他大失所望。因为所谓的实验场所里连个试管、蒸馏瓶这样最简易的器具都没有。面对物资的严重缺乏，汪德熙经过谨慎、细微的屡次实验和摸索，发现从肥田粉中提取原料的方法，可以提高炸药的威力，并研究出最佳的新配方——即在氯酸钾炸药中添加少量的烈性炸药TNT。可是，TNT是受日军控制的化学品。为此，汪德熙冒着极大的风险两次秘密地往返于解放区与天津之间，向叶企孙教授寻求帮助。很快，叶教授在天津安排了清华化学系的另一位才子林风，秘密配制了TNT；并将这种化学品复制成肥皂的样式，混进普通的日用品中，不断地输送到冀中根据地。



竹庭县抗日烈士张涛

祝新华 张作松

1945年11月,为纪念牺牲于赣榆县的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山东省人民政府特将赣榆县改名为竹庭县,到1950年10月又复名赣榆县。按说,抗日烈士应该出现于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前,可在赣榆区墩尚镇的小东关村境内,有一通矗立了距今已有69年的“抗日烈士”石碑,上书“张涛同志之墓”,落款却为“中华民国三十五

年十一月中浣竹庭县政府立”。众所周知,在抗战时期,以县政府名义为革命烈士立碑并不多见,而以“竹庭县政府”名义设立的石碑,更是绝无仅有。

当时尚须隐蔽的县政府,何以会为一位抗日烈士立碑纪念?带着疑问笔者进行了实地走访,才使得张涛烈士的形象,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向我们走来,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

通过雷管引爆炸药,导火索不能精准地控制起爆时间,必须由懂得技术的人现场操作才可以确保成功。八路军珍惜人才,不想要这位才智卓著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冒险上阵。然而,勇敢沉毅的汪德熙不顾生命的安危自告奋勇,沙场领命,强烈的爱国心驱使汪德熙以非凡的胆识和才智完成了这一抗战史上让国人拍手称快、大长中华儿女御敌正气的壮举。

汪德熙出生于江苏海州的名门望族,生活在被称为“淮北盐都”的板浦古镇上。汪德熙的父亲汪寿序是晚清秀才,他的家,一门三杰,出了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他们的大哥就是1945年任厦门大学校长、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的汪德耀。板浦汪家的“一门三杰”,皆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领域里杰出的学者,在他们各自所从事学科的发展史上,无一不是具有开创性成就和里程碑意义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在国内的科技界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和顶尖的学术地位,回归祖国后更有卓越的建树。

完成爆破日军军列的任务之后,汪德熙先后出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助

教。1941年,考上清华赴美公费留学,1946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塑料工厂实习。1947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大学化工系主任,成为一名优秀的高分子化学家,他用邻苯三酚和糠醛合成热固性塑料和不饱和聚酯研制出特殊材料,可以用来制成玻璃钢小汽车的壳体,名噪一时。

1960年,汪德熙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部主任,负责核化学工作。他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试验的研究工作,在引爆点火中子源的研制、爆炸当量的测定、能耗、裂变产额的分析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工作岗位和研究项目,让他常常回忆1938年在平汉铁路上炸毁日军军列的往事。从1938年用自制炸药引爆日军专列到1964年10月16日将自己研制的引爆点火中子源的装置和核试验爆炸当量的测定应用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汪德熙经历了26年的科学等待。

(作者单位:连云港花果山景区西游记研究展示中心)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带着弟弟同参军

张涛(1917—1946),原名张永铎,出身于赣榆县罗阳乡小东关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的东关村是县城通往海州的唯一通道,而成为日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目标。

1937年12月底,日军轰炸机在小东关村上空投下三枚罪恶的炸弹,结果造成10多位村民丧生。悲壮的民族仇恨激发了张永铎参军抗日的决心和勇气,1940年初,时年23岁的他带着弟弟张永华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因担心家人遭到日伪汉奸的报复和伤害,参军后张永铎更名张涛、张永华更名张铁民。

机智勇敢进步快

张涛从小读过几年私塾,识字脑子活。一次,他奉命到家乡附近的东海县太平庄执行任务。不巧,在当夜潜入村子后被一名汉奸发现。汉奸连忙向日军告密,并带领日本鬼子前去偷袭。可让鬼子汉奸万万没想到的是,张涛进村时随身带了一身日本军服。当日本鬼子冲进汉奸密报的院子进屋搜索时,早已换上日军服装的张涛迅速躲到门后,等鬼子小分队全部进入房间,他迅速从旁门冲出排在队伍的后面,并用手指着门外,模仿日语大声地哇啦乱叫。当时已是深夜,不明就里的鬼子看见“同伴”焦急地指着门外,以为八路早就夺门而出,便像无头苍蝇似的跑到院外顺着张涛指的方向追赶。就这样,张涛等鬼子跑远后,从容不迫地从太平庄安全撤回。

还有一次,张涛随队伍来到临沂大店村,他与战友在村外侦察敌情时,与一路日军遭遇。战友们见状迅速撤退,可此时的张涛正是疾病缠身,已无力奔跑,眼看鬼子就到跟前,机智的他顺势一滚,就滚到路边一棵大树根旁的干草堆里,从而得以安全脱险。

张涛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受到上级的表彰。他先后担任部队书记庶务、军事教员、连长、参谋、华东军政大学(今陆军南京指挥学院前身)五队副队

长等职。其间,立功多次,后人曾在他的遗物中发现过一枚山东军区颁发给他的三等功军功章。

英年早逝立碑纪念

1946年11月,张涛积劳成疾,因战事延误治疗,病逝于临沂大店村,年仅29岁。遗体运回故里小东关村,被安葬于村后的公墓中。竹庭县政府专门为他立碑纪念,石碑高212厘米、宽76厘米、厚21.5厘米,方额抹角。因当时东关村地属国民党统治的边缘区,竹庭县政府在为张涛烈士立碑时,还特地选择了距离其坟茔约1500米远的村大路东旁,将墓穴与墓碑分置两处。

果不其然,1947年,墓碑被国民党还乡团推

倒,但按墓毁尸的阴谋未能得逞。赣榆解放后的1948年11月,墓碑重新被立起。1980年3月,烈士遗骨迁往抗日山烈士陵园安葬,



位于罗阳的张涛烈士墓碑

墓碑留于原地。2007年,张涛烈士的墓碑被迁移到罗阳垂钓中心风景区,镇村为石碑修建了引路、台阶,四周还栽植了松树。2008年4月,赣榆县政府将张涛烈士纪念碑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张涛烈士的弟弟张铁民,1945年负伤离开部队,后任国家交通部机械处处长。2001年去世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单位:赣榆区政协)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六)

(1944.1—1945.9)

本刊编辑部

1944年

1月

10日,伪和平救国军第36师第71旅重新编成,徐继泰代旅长,辖第141、第142两团。

10—20日,淮海军分区对日伪发起攻势。10天中,相继攻克灌云县之南城(现属高新区)、捻头、史集、新集等日伪据点。

伪军李亚藩部被歼后,伪第71旅赵静波大队去山东填防。早就向往抗日的朱训生在途经岑池河北陈楼附近时,决然率两个排归附抗日民主政府。灌东办事处随即决定建立伊东乡政权,并委朱训牛为乡长。

中共海陵县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精神把查减工作、发动群众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在全县进行查减、退租、拔地、反黑地斗争。

淮海军分区第3支队第7团团长崔维杰在朱湾战斗中牺牲。

从1月起,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在淮海区发动攻势,历时3个月,克汤沟、钱集等30余处据点,粉碎日军第二期“治安肃正”阴谋。

2月

滨海军区第23团第3营在赣榆县墩头伏击日军,激战竟日,击毙日军50多名。

3月

22日,东海县安峰区捕获反动道会九宫道(又名收缘道)头子10余名,并将主犯周学兰正法。

山东军区派赵尚忱在日照岚山头村建立职业情报点——万顺商行,以万顺商行为基点,联系沿海各有关商行对连云港、青岛、上海等沦陷区城市

进行情报和海上交通联络工作。

下旬 新四军军部向第3师下达组建独立旅、增援皖江地区的命令。第3师即从师部和淮海军分区机关抽调干部,成立独立旅旅部,抽淮海第2、第3支队归独立旅建制。为补充第10旅兼淮海军分区主力的力量,于4月下旬抽调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各一部,组建新1团和新2团。

4月

19日至5月4日,淮海军分区发动高杨战役。此役历时16天,共计攻克敌据点14处,炮楼150余座,全歼敌伪军2000余人,毙伤新安镇等地出援之日军140余人。淮海军分区伤亡连以下指战员496名。高杨战役胜利,收复六塘河两岸地区。



高沟杨口战役要图



灌云警卫团成立,中共灌云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孙良浩兼任团长,县委书记吴书兼政委。灌西武装编入 1 营,灌东独立营编入 2 营。

5 月

12 日,海陵县召开全县人民武装代表大会,嘉奖表扬了一批战斗英雄和民兵模范。高广珍获“劳武结合模范”光荣称号。

下旬,东海县政府破获“新国民党”反动组织,枪毙了庄士林等 4 名要犯。

滨海军区通讨内线关系,在青口敌伪据点内部购买 1 台德国制造的 4 开铅字印刷机,冲破敌伪严密封锁运到大众日报社投入生产。

7 月

5 日至 7 日,海陵独立团拔除大兴庄敌据点,并在演马庄消灭了日军 1 个小队,共毙俘敌伪军 300 余人。滨海军区通令嘉奖,授予该团二连“演马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

7 日,滨海军民 5000 多人在赣榆抗日山集会,对抗战以来在滨海牺牲的烈士及国际友人希伯、金野博等烈士举行公祭。罗荣桓、黎玉、肖华为国际友人希伯题词。

14 日,灌云伪军唐作汉率部反正,被委任为蔷薇游市大队长。

中旬 中共滨海区党委和滨海军区决定成立淮海工作委员会,李明为书记。

八路军第 115 师政委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在奥地利医生、共产党员罗牛特的陪护下穿海陵县跨陇海铁路经东海县,20 多天后到达苏北盐阜区。在盐阜区仅休息 4 天,得知山东局势严重,返回山东指挥反“扫荡”战斗。

8 月

10 日,淮海行署颁布《红黑点登记办法》,对伪军、伪人员展开政治攻势,并依此办法处理敌伪军政人员。“红黑点登记办法”即对伪军政人员以红点记其做的好事,黑点记其做的坏事,均记其名下。“红黑点”登记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在敌伪军政人员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20—29 日,万余日伪军展开报复性“扫荡”,滨海军区主力部队及民兵给予严重打击,各路敌军全部溃退。

26 日,东海、灌阳两县合并为东海县,江剑农任县长,万众一任县委书记;地方武装同时合并,灌阳警卫团和东海大队合并为东海警卫团,王涌吾为团长,万众一兼政委。

海陵县爆炸大王高广珍在山东省八一群英大会上被评为一等民兵英雄。

9 月

13 日,伪新中央军第 72 旅第 144 团及东海的惯匪王发友窜踞董马庄、白塔埠之间蔷薇村修筑工事,企图伪化新民区。海陵独立团夜间攻入蔷薇圩内,击毙伪连长夏某等 20 多名,活捉 27 人,拆毁据点,粉碎敌人阴谋。

29 日,敌华北轮船联营公司“北京号”轮船(载重量 230 吨)在海头东北海上搁浅,为滨海军区第 23 团俘获,活捉日伪人员 43 人。

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县大队长樊彦英等 177 名烈士,海陵县集资在磨山建造抗日烈士纪念馆。参议会副参议长杨凤鸣、参议员宋佑康、柴俊英负责筹建。次年 4 月,纪念馆落成。县长铁秋作序。

孟冲和李明德率领的滨海武工队在地方主力和内线的配合下,于牛山至石湖的张谷桥上下炸翻日军铁甲车 1 列,日军死伤近百人。

10 月

东海创办农民大学,县农会会长李铁民任校长。8 个区设农大分校,共有学生 5000 多人。

11 月

14 日,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划下,日伪“爱媛丸号”轮宣布起义,抵达赣榆县柘汪口。滨海军区司令陈士榘将“爱媛丸号”改为“爱国号”。

中旬 伪徐继泰部配合灌云、东海伪保安队共 3000 余人,借伪孙良诚部讨境之机,对灌东地区进行第二次残酷“扫荡”,大部分村庄被烧光抢光,死伤群众 500 余人,成年人大部分被抓。中共党政军机关撤离了灌东,进入灌东。

海陵独立团扩编为滨海军区独立 1 团。

12 月

3—13 日,侵华日军第 65 师团松川大队、南渡大队、涑源部之原田大队及另外 3 个中队与伪潘干臣、吴漱泉、徐继泰等部及海、赣、沐、灌、阜、沭等县



保安队共计伪军6万余人,分路出动,向淮海地区“扫荡”。苏北主力部队、地方军和民兵进行激烈的反“扫荡”斗争,日伪“扫荡”计划被粉碎。

6日,淮海军分区第1、2、3支队攻打大伊山镇,歼灭灌云伪保安大队第一、二大队一部及该镇的伪区、乡武装,拔除伊山周围4个据点。淮海军分区第2支队第6团政委焦占宝、淮海区甲级战斗英雄陈建亭在战斗中牺牲。

23日晨,沐阳伪军400余人,配合日军向东海县新河区庙头乡进犯,3支队第7团迎头痛击,攻克木匠庄据点,毙伤敌伪50余名。

江潮率海陵独立团夜袭白塔埠据点,生擒以张锡本为首的伪中队及日军80多人。

日本特务南荣西冈与3名雇员投诚,并参加日人反战同盟。

年底,淮北盐场1300名盐民被日寇骗到东北挖煤。

1945年1月—9月

1月

19日夜,东海县陇海游击队长吴廷斗率领战士袭击张谷乡公所,俘乡丁10余人。

21日,滨海军区第23团、海赣独立团及县武委会联合进攻赣榆县半店子,吴山、门河等区民兵配合作战。次日夜,对敌据点爆破成功,全歼守敌,俘伪营长高彦田、突击队长李传佩等500余人。

海赣独立营扩编为海赣独立团,副团长朱开智,政委杨大易。

中共滨海区党委、滨海专署决定组建中共芦山县委和芦山县政府,雷明玉任县委书记,刘慕文任县长,隶属滨海区党委三地委领导。

2月

12日,东海县安峰区联防队配合民兵将房山至草街的电话线割除、电线杆砍倒。

东海县警卫团更名为淮海警卫团,团长先后有温润生、曹涌三,政委万众一、李铁民。

3月

李铁民任中共东海县委书记,万众一调任中共淮海地委书记。

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洪学智带领第8旅第24团、第10旅第4支队和滨海独立团等部向灌东之敌发起全面进攻,攻克据点12个,毙伤敌200余人,俘敌百余人,夺回了灌东地区。

5月

中旬,日军800余由山东莒南经黑林进入赣榆县,在吴山前与滨海军区第23团遭遇,激战半日,双方伤亡都近百人。第23团团部小鬼班英勇参战,全班壮烈牺牲。

滨海区成立中共海赣工委和海赣办事处,杨荣杰任工委书记,刘东岑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主要任务负责赣榆南部、海陵东部的临洪、七里沟一带的工作。

6月

14日,在淮海警卫团、地方区乡队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击溃长期盘踞在陡沟的伪李十中队,拔除了陡沟伪据点。驻龙首伪军中队长赵正壁带兵增援,被淮海警卫团击毙。

东海县东北办事处成立,主任顾东山。下辖青伊、蔷薇、湖东3个区。同时成立中共东海县委东北工委,由县委委员叶志俊兼书记(1945年10月,恢复淮阳县治,东北办事处、东北工委撤销)。

中共滨海二地委书记谷牧在赣榆城头召开县、区以上干部大会,号召全县军民动员起来,保卫沿海,粉碎敌人进攻。

日伪连云港港务局“安汉丸”号、“英德丸”号拖轮起义,先后驶往根据地赣榆县柘汪口。陈十架司令员将两拖轮分别改名为“解放”号和“民主”号。连同原先起义的“爱国号”轮船,编为滨海军区海防大队。

东海县民兵总队成立,总队长邓昆山,政委李铁民。

7月

1日,滨海区武委会召开嘉奖山东一等民兵战斗英雄大会,海陵县民兵高广珍受到嘉奖。

5日,盐阜、淮海两行政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组成以李一氓为主任的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简称“苏北行委会”)。原淮海行政公署改组为淮海分专员公署,吴觉任专员。东海县、灌云县属淮海分专员公署管辖。



8月

下旬,海陵县政府在李埭村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土匪李开珩。公审后执行枪决。

11日,山东八路军改编为山东野战兵团,滨海军区所属部队改编两个师(第1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两个警备旅(警备第10旅、第11旅)。

13日,在侵华日军即将投降之际,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布通令,要求苏北各城市收复之日,各县具政府原划定区域有县城在内者,应即迁回执行善后驻复兴工作。淮海区板浦应由灌云县政府迁入。淮海区政府应即动员县队、区队民兵配合主力收复各城市。

14日至9月4日,淮海警卫团配合灌云警卫团在20天内攻克万山、龙庙、鸭河、屋片、茅片、叉路口、周沟等8处据点。

山东省政府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分别决定成立海州市政府,市长于化琪;连云港市政府,市长孙笃生。后因海州、连云港等地被国民党抢占而未施政。

13日,山东野战兵团第2师、独立第3旅与赣榆、芦山两县2000余名民兵向赣榆城、青口、沙河、柘汪等日伪据点发动进攻。21日,赣榆县城、青口、沙河口等地全境解放。

涟东、涟西、灌东民兵及涟水警备大队、灌云警卫团第2营第2连,围困新安镇,迅速扫除外围据点。9月13日,收复新安镇。

14日,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武委会改为人民武装部。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

25日,日军投降。国民政府第十战区在港口设置检查、监督机构。

日本投降后,淮海军分区部队配合县区武装接



新四军集会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准备大反攻的指示

管淮北盐场,至张圩埭遭国民党阻拦,中正场的西半场(即今台南场)和板浦场(即今台北场)未获解放。

下旬,淮海军分区司令部、淮海分区专员公署发布《淮海分区戒严条例》。同期,陈毅命令“新四军在江北方面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根据地的基础,第2、3、4师应迅速出动,巩固地占领津浦路。”第3师第7旅奉命推进至怀远,师直和第8旅推进至盱眙、涧溪,第10旅推进至高良涧待命。

9月

月初 淮海地区召开大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8日,新四军第10旅向盘踞在响水口一带的伪徐继泰部发起进攻,歼敌300余人,解放了响水口、大伊山、杨集等地。

海陵县调集全县民兵1800人,编成8个大队,分头配合主力部队和独立团,向石湖、牛山、曹浦、董马庄等11个据点发起猛攻,全歼海陵境内日伪军部队。

芦山县撤销,该县所辖地区划回赣榆、日照、莒南三县。

是月,海赣、海陵独立团开赴东北。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西游记》与西游城

——中华经典的呵护与彰显

李洪甫

中华人文，林林总总；究其播传面之宽广，知名度之高远，无过于“四大名著”。偎依太湖的“三国”“水浒”二城，纯属人工打造的景观，却在国家首批5A景区的评选中捷足先登；与大观园有着深刻关联的恭王府更是人满为患，其间，不乏深目高鼻来自欧美的观光客。毋庸置疑，这些人文景观的整治和装点，着实地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休闲者带来无可替代的愉悦。

这就是出游动机中浓郁的“名著情结”。裹挟着民族经典的精品打造，使主题公园的创智远未落寞到江郎才尽或“书生已老”。

《西游记》，中华人文的贯通和精粹

就弘扬中华人文的精神而言，《西游记》所推崇的苦行求成、百折不挠的进取志向，怜悯贫弱、援救生灵的慈悲情怀，相依为命、同舟共济的团队信念，皆是卓越高迈的情志和操守。

四大名著，各具“伟大”，被视为“中国小说的最高成就”。但对比《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记》鼓吹的宗旨大义，堪称精良向上，尤能励志，更加阳光。

《西游记》阐释主旨的精粹还在于表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正如唯一一种没有被删节过的清代刻本《新说西游记》所称：《西游记》就是一场团圆会的演出。唐僧外公殷开山的“相府团圆乃小团圆”，到五圣成真——取经东归，三教原，“方才是真正大团圆。”

这里所说的“相府团圆”，在海州云台山（今连云港花果山）主峰和山麓各有一处“九圣团圆宫”的遗迹存留，供奉着被津津乐道的九位圣贤。长于考证学问的乾嘉学派里，有一位名叫凌廷堪的“府学教授”，曾经做过《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老师，他有几句游览海清寺塔和团圆宫之后的叹喟：

路入云台境，团圆识古宫。

山光苍树外，塔影白云中。

九级功施普，千秋享祀崇，

荒唐稽古实，野语笑雷同。

这“雷同”的“野语”，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么！海州状元陈光蕊上任途中被害又复活团圆的悲情故事，传承千年；门楣上镌有“根深固蒂”四字的九级宝塔也被牵连到陈家的“祖墓”。唐僧父亲陈光蕊的善良和发奋；唐僧祖母张老太夫人的大义和贤德；唐僧母亲殷小姐的贞贞和坚忍；青年玄奘的孝亲和胆魄，皆以巨大的感染力，激



发众牛良知,净化万千心灵。

“团圆”的九位圣贤是谁?除了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三藏禅师及其父亲陈光蕊、母亲殷小姐,祖母张氏以及外公殷开山及宰相夫人外;加上三藏禅师的三个兄弟天、地、水三官,恰是一幅立体的“全家福”。团圆宫的一侧,又有载入地方志的陈家的祖茔——“陈光蕊墓”“相墓在其侧”。团圆像中,状元陈光蕊、宰相殷开山是儒家的代表;三藏堪当佛界之显赫,而三元则是道教的高端人物,凡此,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交融和团圆。

《西游记》的人文建树也是其它名著难以比拟的,主人公唐僧是一位“历天险而志愈慷慨,遭凶贼而神弥后勇”的旅行家,既志向高远、勇敢无畏,又血性刚强、果断有为——宁可舍弃孙悟空的保护,也要继续前行,坚守“博爱”不杀生的信条。一位文弱书生,历时 17 年,往返十万里,途经 128 国,译经 75 部、著述 1300 万字……此等经历和成就,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页。遍检《三国》《水浒》《红楼》的各路豪杰,谁人堪与相提并论?

所以,鲁迅说:唐僧是“中国脊梁式”的人物。

《西游记》的男一号孙悟空虽是一个虚拟人物,但在现实世界里有石猴陀、悟空和尚等原型。他的神勇仗义,驱邪扬善正是中华民族极力推崇的正面人格,他师从“三教合一”“讲一会道,说一会禅”的学者须菩提,时不时口中还能讲出几句漂亮的《论语》,是一只标准的“文化猿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专著《中国的长臂猿》里讲得精彩:

“孙悟空是一只被流浪诗人和高雅隐士所熟知的最珍奇的长臂猿。”

用心良苦的小说家就是要从“满纸荒唐言”中推陈文明的精髓,就一个有现实原型的虚拟人物寻根起源背景抑或“人文发祥(老家)”之类,无可厚非。许多堪称哲人的文化巨匠也有类似的论述——

梁启超说:“中国大多数人的哲理意识出之于《西游》”。

鲁迅说:“《西游》之妙正在于给妖怪以喜怒哀乐”。

“倖神魔皆有人情,妖魅亦通世故”。

董作宾说:“水帘洞是美猴王的发祥地”。

胡适之说:“《西游记》是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这部书的结构,在中国旧小说中,要算最精密的了。”

连云港,西游故事的发蒙和起源

明明是洛阳偃师人的唐僧怎么会成了海州(今连云港市)人?尽管作者吴承恩有相居地在海州的乡土情结,改变唐僧籍贯的始作俑者却是早于小说的元、明杂剧《西游记》。杂剧开演的第一场,不提当时的大都市长安、洛阳,开篇就说:选一位取经人,托化到“中国海州”。“海州”之前,无须冠以什么“道”“府”“省”,你看这知名度!

到了明万历初年,根据吴承恩稿本刊刻的朱本《西游记》在“第四卷丁集”《陈光蕊及第成婚》里,居然能交代出开有一家文具店的海州十字街:

“有一人,姓陈名萼,表德光蕊,忽一日,前去海州城内去买文房四宝。行至十字街头,只见城市中无数人唧唧唧唧,纷纷看榜。”

明代海州有十字街?岂止是有!它被由吴承恩的挚友陈文烛作序的《隆庆海州志》记录在《街市》之首:

“十字街,在州治西,四通皆有集市。”

吴承恩不光知道海州十字街,还珍藏了海州刺史李崑写的《娑罗树碑铭》拓片,陈文烛还借助这张拓片恢复了娑罗树碑。

花果山是西游故事最主要的背景之一,刻于吴承恩死后十年(1592)的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是现存最早、最可靠的西游善本,学界称作“世本”,有 13 处明白无误地指称花果山在“东胜神洲”的大海之上,无一处说到内陆或其他所在。所有的《西游记》版本皆明白无误地交代了花果山必备的“硬件”:海水、海风、海岛;靠近“东海龙宫”和“杨二郎的灌口”以及海上“傲来国”;是众多河流入海口的“百川汇处擎天柱”。迄今为止,全国有 28 处旅游地



号称花果山,却没有一处拥有这起码的硬件。

“西”学家将花果山视作通篇故事的根源。清乾隆时期的张书绅在《西游记》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的评批中写道:

“一部《西游记》,以东字起,西字终;始于万花店,结于婆罗蜜;此所以为花果山,而遂名为《西游记》也。”

依照《西游记》“证道学派”的诠释,贯通西游故事的红线就是:海清寺塔——花果山灵根——海州花萼陈光蕊——万花店唐僧认亲——唐三藏取经证果。东胜与西天、大海与灵山,遥相呼应,构筑了一个硕大的西游时空。一部小说的地望,何能有如此雄阔的跨越?早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之际,学者就注意到这座文化名山的非同一般。1923年,胡适之在《西游记考证》里收录了北平研究院董作宾的一段文字:

“因为看《淮安府志》的时候,偶见《艺文》里有《朱世臣题云台山水帘洞》的标题,想到水帘洞是美猴王的发祥地,也算这部《西游记》的出发点……《姚陶登云台山记》:‘由殿东石径上里许,为水帘洞……云为三元兄弟修真处。’”

这位后来在台北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甲骨学泰斗是将海州云台山与《西游记》中花果山相联系的第一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就此线索写出论证,也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连云港不仅有一座花果山,南境的灌南县还有一条被《西游记》写作与杨二郎紧密相关的“灌洲”“灌河口”,吴承恩的祖居地就在灌河岸畔。他在为灌河的一位乡贤刘承业写的墓志铭中虽然指称自己与墓主是“乡里”,却说刘氏是“淮郡安东人”,而自己是“淮人”。就是说,吴承恩认为自己的先世祖居地不是明代的淮安府安东县,而是古海州境内的旧涟水。这就是吴承恩为什么执意要自号“淮海浪子”、“淮海零儒”的殷殷乡愿。

《西游》故事的核心线索原本是唐僧由长安出发的西天取经路,作者却用大量的笔墨铺陈海州的

掌故和风物:海上花果山、灌口杨二郎、沙河口、黄风洞、平顶山、玉女峰、大仙庵、人参果、清风明月、金银二妖、七十二洞……书中7次写到唐僧的籍贯,次次认定海州。《西游记》里的海州方言更不胜枚举。笔者新近修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第3版就第2版(以下简称“人文本”)中有关海州、灌南地域方言的勘误多达40余例。

吴承恩对海州的拳拳乡恋,驱使他在《西游记》中将家乡的山水、地灵、风物、人杰、乡音、谚语尽情铺陈、大体量地铺排和数说。二十卷、一百回的字里行间,触目皆然。许多读过《西游记》、登过花果山的观光客叹为观止:连云港不愧为《西游记》文化的发祥地!一位住持于南京某寺的当代高僧游历花果山后诗情大开:“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虽有溢美之意,却不无真实感悟。

在这样一座真山真水、原汁原味的《西游》背景地构筑“西游城”,于选址立意、创演主题、呼应文献、衔接遗迹,堪称百利而少弊!

西游城,中华经典的呵护与彰显

承担“西游城”建设的单位要我为主题公园的名字给些建议,我说,三国城、水浒城红了几十年头,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西游城,尤其是在全国数十个与《西游记》相关的人造景观很不景气甚至门可罗雀的情状下,呼唤高品位的西游城,当是成千上万旅游者的共同心声。

沐浴在太湖水里的三国城、水浒城虽与环境的人文内涵少有切实的关联,但是,作为央视历史故事片的外景地,为这两处人造景观披上了遗迹的外衣,游人的审美心理是在追寻着荧屏上的记忆。此为三国城、水浒城能够得以成功的先决要素。

连云港的西游城偎依在花果山的西麓,距海清寺塔及大圣湖仅百米之遥;本身就是以唐僧兄弟三人为祀主的三元宫建筑群下院的基址所在。在这里建西游城可以与原牛迹的花果山景观血脉交汇、筋骨相连。西游城虽然定位于人造主题公园,却有着



厚重的遗址、遗迹内涵,先天的文化品位让建造者多了一份成功的胜算。

由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以来的海岸变迁,花果山和傲来国三个城池的海上生态遭遇变异;加之日军战火的劫掠《西游记》第24、25、26回人参果故事的发生地大仙庵以及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就得到皇家敕谕的团圆宫仅余残垣断壁;南天门、点将台乃至猪八戒在花果山看到的“九派分流水”面目全非……而主题公园擅长的模拟海浪、古景观复制等打造手段在园内有了宽阔的用武之地。西游城可以成为花果山遗址景区内涵的承接、有机的延伸、必要的补充、合理的渲染,从而一体组合,虚实呼应。如能实现,西游城可以是最著直观的诠释和彰显,是对核心景区文化资源切实的呵护。当然,此举需要科学的谋划,精心的运筹,着意的营建。

富民生,文化产业的充分放大

据连云港花果山景区的年度报告和连云港城市年鉴资料乃至2011年人代会上市政府提交的工作报告,“十一五”期间,花果山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5%、18%”。2010年,到访花果山的异地观光客突破70万;市民年卡及景区免费通行证超过30万张,其间还不包括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乃至较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端接待。百万客流量的固有市场将是未来西游城可靠的“一级客源市场”,因为,西游城正处进入花果山景区的必经之路。

西游城紧接花果山景区,与连云港市的科教园区、大学城以及旅游服务中心和游客集散地咫尺毗连;对主题乐园景观有着较大向心力的近10万名大学生甚至可以由原驻地步行进入;西游城的入口距海州古城9公里、距市政府所在地只有3公里;至宁连、沿海、连霍、同三高速路口2公里、机场25公里。它的可进入性明显地优越于花果山核心景区。时空地利,人气商机,绾接于斯。

国际游客的到访人数一直是连云港客源市场的薄弱环节。大多数洋游客对迪斯尼乐园的欧式童话风格情有独钟,对花果山核心景区的文化元素却“食而不知其味”,只能看看热闹,缺乏理解,缺少共鸣。实际上,韩国从明代初年开始、日本从江户时代宝历8年(1758)开始,已经有了西游故事的翻译本。目前,英、德、法、意、西、俄、捷、罗、斯、瓦希里、朝、越、波、匈、世界语等《西游记》译本已近20种。日、韩、美、新加坡、英、法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有讨多种版本的影视作品,日本的木偶剧、韩冒险动作影片、英国话剧等《西游记》作品极具特色;上海世博会期间,日本团结木偶剧社的《西游记》演出了300多场,备受观众的青睐。

西游城的建设与运营,将大幅度扩充花果山的国际客源市场,迅速提升到访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大体量地拉动区域经济。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每年将吸引1.4亿之多的国际游客。因此,西游城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连云港现代服务业将面临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

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还在于旅游市场的膨胀带来的投资商机。

同时,西游城的决策、设计、投资、建设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连云港西游城只有通过与《西游记》原著相结合的高品位、高性能的游乐项目设计,借助最前沿的高能数字技术提升娱乐、体验、参与、互动的吸引力,让游人进入神奇梦幻的西游故事境界,并将传统的文化元素与国际时尚有机结合,维系西游城文化要素的本土原生态;突出产业的传承性、独立性,拥有独占性的知识产权,才能变愉悦休闲为具有持续性发展的生产力。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镜花缘》传说： 一部奇书产生的土壤

崔月明 刘兆元

《镜花缘》传说是古典名著《镜花缘》成书前后在海州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关海属地区民风民俗、风土人情、文化活动及与作者相关的故事传说。

清代文学巨匠李汝珍的古典名著《镜花缘》，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展示的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生活画卷，特别是海属地区乾嘉年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当时社会大背景和地方小环境相融合的产物，极具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可以感知劳动人民非凡的文学艺术创造。而与小说《镜花缘》相关的这些传说故事，都与名著《镜花缘》的作者所生活的地域民俗风物密切联系，每一个传说故事都是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与心态的反映，奇特的构思、美妙的想象、深刻的讽喻、大胆的夸张、真切的情感、幽默的意趣、睿智的哲理、朴实的语言等艺术之光随处可见，浓郁的海州地方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历经两百余年，经久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州板浦古为东夷之地，史属东海名郡。远在四五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是古史中所指的以鸟名官、以鸟为图腾的“少昊之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带最早经历的是东夷文化与齐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继而是河洛文化、吴越文化的浸淫，当然还有早期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随着两淮盐业的兴盛，淮扬文化与齐鲁文化又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新一轮的碰撞与融合，这些都是旷世名著——《镜花缘》产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镜花缘》传说的历史渊源

李汝珍在板浦生活著书的三十多年里，板浦正是海盐之利十分繁荣的开放商埠口岸，每天盐船往来，带来了大量社会、经济、文化的信息，也带来了海内外各地的逸闻趣事，这些源源不绝的素材，让“聪明绝世”且“穷探野史”于学无所不窥的李汝珍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从而成为他创作《镜花缘》的重要素材和参考数据。

李汝珍（1763—1830），祖籍直隶大兴（今北京）人，20岁跟随到板浦做盐课司大使的兄长李汝璜来到板浦。后娶板浦名门望族盐商许氏为妻，在古镇板浦生活。他广泛地搜集海州地方风物、乡土俚语以及古迹史存，“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种笔墨”，旁征博引，创作出“无一字拾他人牙慧、无一处落前人窠臼”，独具地方鲜明地域特色的传世巨著《镜花缘》。传说因书而名世，书因传说而丰富。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传说在海州民间不断衍播，几经俚语口传，几经文人润饰，成为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

民俗风情：《镜花缘》的重要素材

1. 不讲港

《镜花缘》用一半的篇幅，描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和唐小山等三次海上旅游生活。然而，林之洋



在海上一往返三次,历时四年零三个月之久,从未见船讲过一次港。所到之处,总是把船一是靠岸,二是停泊在山脚下,三是收口。

云台山原在海中,现在云台山的东端仍在大海中,至今从高公岛到塘沟北固山的山脚下都能停船。李汝珍把林之洋的海船安排“停泊在山脚下”,是合情合理的。海州湾内以云台山为中心,南有埭子口、黄河口、响水口,北有临洪口、下口、青口。而青口与响水口都已成为相当规模的集镇。尤其是海属四县各地,沙河口、黑风口、湖东口、张口、李口、魏口等许多地名冠以口子的比比皆是。李汝珍在构思乃至成书时,耳闻目睹,周围到处是口而无一港,所以林之洋也就只好常常“收口”而无港可讲。

明明是船讲口靠岸,为何不用“讲口”而叫“收口”呢?这又是受当地海州湾渔民风俗习惯所制约。千百年来,渔民们乘着简陋的木帆船在“无风三尺浪”的大海上捕捞,对于大自然的灾害没有抵御能力,全靠精神上的安慰和操作规程的严格来化险为夷。所以渔民们平时一言一行,事事处处要图吉利,忌讳很多。犹如把船下海叫“出海”,捕鱼叫“取彩”,拔篷叫“起篷”,撒网叫“下网”一样,“讲口”是犯忌讳的话,以为“讲口”就是鲜鱼讲猫口,活人讲虎口。渔民们很讲究放得出收得回。放出是本收回是利,放出是希望伴随着危险,收回才是喜悦和安全。直至今日,渔民们还用收口、收港、收岸,而不用讲(入)口、讲(入)港。

2. 门户山

《镜花缘》中写了三次出海,每次开始都遇到门户山的阻拦。对于门户山的情形,第一次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出游时作了简单的交代:“走了多日,绕出门户山”(第八回)。第二次出游是林之洋、多九公带着唐小山到小蓬莱寻父,小山奉父命更名唐闺臣回家考才女,在归途中作了较详的交代。林之洋说:“俺细细核算,若遇顺风,朝前走去,原不过两三月程途;奈前面有座门户山横在海中,随你会走,也须百日方能绕讨。”多九公又作了补充交代:“当年老夫初到海外,路过此处,曾问老年人:此山既名门户,为何横在海中,并无门户可通,令人转弯抹角,绕至数月之久,方才得讨?那老年人道:当日大禹开

山,曾将此山开出一条水路,舟楫可通,后来就将此山叫作门户山。谁知年深日久,山中这条道路,忽生淤沙,从中塞住,以致船只不通,虽有门户之名,竟无可通之路。此事相沿已久,不知何时淤断”。(第五十三回)由此可见,门户山的位置是横在海中,阻挡出海去路;山形很大,周围要绕三个多月才能走完。

渔民在海中,尤其是出远海,除特别讲义气外,在过去没有航标灯塔和经纬仪的情况下,至关重要的还是记山门看山门。两山之间的间隙叫山门。从不同的角度望两山之间的距离有大有小,甚至相距很远的山能看成是重叠的。随着角度的转移,可见两山的距离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渔民把这叫开山门和关山门。船在海中行驶,都以某山门开关得大小来断定自所在的位置,距离目的地尚有多少路程。

开山门和关山门常常会给渔民们带来喜悦和忧虑。在东边海面上远望云台山,有三道“阴阳门”。这里所说的阴阳,不是生死雌雄的阴阳,而是“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只要南北二山阴阳面之间有距离的,就构成阴阳门。云台山中的三道阴阳门,从南向北是:一、凤凰门,东藏山与大岛山之间,因为有南城凤凰城而得名,二、五羊门,南云台和北云台之间有五羊湖,三、鹰游门,北云台与东西连岛(鹰游山)之间水面。也有说云台山有三道鹰游门;第一道是南云台与中云台之间;第二道是中云台与北云台之间;第三道是北云台与连岛之间。云台山地区的主要渔村连岛、陶唐、海棠、西墅的渔民从南洋取鱼归来,一见到凤凰门开,就说明天的风险不存在了,很快就要与家人团聚,心情就很高兴。讲了五羊门,船头便立刻向西北,直讲鹰游门,准备收岸回家。

3. 云台山秘方济岐舌

《镜花缘》中的多九公,有许多祖上传的济世良方,对于一些常见病、疑难病、职业病、地方病,尤其是跌打损伤、折骨断筋的,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不啻仙丹。在古代外科医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云台山地区,调有伤筋断骨,济世良方有三大件:童便、黄酒、山螃蟹。其中黄酒穷人无钱购买,童便应用也不广,一方面病人不愿意喝,主要方面是一些家长



迷信,不愿意自家畜便给人喝。除非是伤势严重,病人昏迷,大家都愿“行好”才接些畜便喝。使用最最多最广的就是山螃蟹,确实效果也好,至今群众中仍把它当作济世良方。

云台山牛长的螃蟹,群众称之山螃蟹,其身大如铜板,四季栖息于岩石缝隙。把石头扳开就可取得,当地群众称捉山螃蟹为扳山螃蟹。凡是常年能挂住水的山涧里,都有山螃蟹生存。今云台山中山螃蟹数量较多的是龚大井、瓢洞、魏康大洞、大青洞、渔湾洞。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蟹体肥大,接骨力强)的是大青洞的“大鹰嘴”和渔湾洞的“十亩地”,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捉到活蟹。用山螃蟹接骨,不仅山区普遍应用,就是高山周围几十里的城镇乡村都喜应用。凡遇人畜伤筋断骨的,都要到山上扳些山螃蟹治疗,而且确实有效果,正是山螃蟹接骨如此有效,山外的人往往到山上不惜重金购买,相应出现了一些山民以捉蟹为黄牛,平时捉些螃蟹放在水桶里储存,专供应急之需。云台山民间用山螃蟹接骨,主要用法:将伤处复位后,用鲜山蟹三只捣烂,蟹汁温酒冲服,所剩碎蟹壳敷于患处。

4. 桑墟十湖

海赣沐灌地方有口皆碑:“桑墟大姐会裱牌”。其实桑墟街上,绝大多数人,男女老少都会裱纸牌,只有女孩子心灵手巧,裱出的纸牌品质好,销得快。因此,桑墟附近几十里范围内都想到桑墟攀亲,在旧社会谁取了桑墟的姑娘,谁全家就有了饭碗了。后来桑墟附近几十里范围都能生产纸牌,都是桑墟嫁出去的姑娘传授的。这样“桑墟大姐会裱牌”就越传越远越响。桑墟人裱的纸牌,就是《镜花缘》中第六十八回、七十三回、七十四回等多次提到的“十湖”。

5. 石榴五色花

《镜花缘》写武则天酒后失控,“火攻”群芳圃和十林苑,催百花违时开放。内中惟石榴开得最盛,武后即命宫人赏了金牌,并奠御酒。公主见状,对石榴赞不绝口,并问其来历。武后道:“此处石榴,乃朕特命陇右节度使史逸从西域采办来的。据说此花颜色种类既多不同,并有夏秋常开者。此时不但开出异色,且多怀中抱子。世俗本有‘榴开见子’之说,今又开出怀中抱子,多子之相,无过于此。宜封为‘多子

丽人’。朕见此花,偶然想起侄儿武八思,年已四旬,尚无子息,昨朕派往东海郡镇防海口,何不将此送去,以为侄儿得子之兆?”于是吩咐太监,俟宴讨群臣,即将石榴二百株,传谕兵部,解交武八王爷查收,——此花后来送至东海郡,附近流传,莫不保护。所以沐阳地方,至今仍有异种,并有一株而开五色者。每花一盆,非数十金不可得,真可甲于天下(五回)。沐阳从公元前二世纪建县,名为厚邱、建陵、阴平,几经沿革,到南北朝即公元577年正式定为沐阳县(在沐水之北),至今未有异名,这里历史悠久,土地肥沃,人民黾黷文明而勤劳,向有植树种草、修竹赏花之美俗。沐阳境内许多庄名地名都冠以“花”字,花团、花湾、花圩、花庄、花园、花厅等,不胜枚举。还有许多村庄虽无“花名”却有“花实”。

沐阳绝大部分是沙质土壤,气候温润,石榴种植容易,生长旺盛。在历史上几乎每家院内正屋(堂屋)门两边窗下都有石榴树,既好看,又实惠。人们对石榴甚为崇拜,把它当作多子多福的象征。男女结婚时,新房顶篷,嫁妆的脸盆饭碗,都要用红纸剪一个开裂见子的大石榴贴上,表示榴开见子,子满堂。

沐阳的石榴分为两大类:一是子石榴,在赏花的同时,主要供食用和入药;一是花石榴,每年五月开始见花,不断更新交替,一直可开至霜降。石榴花有朱红、银红、杏黄、白玉、紫黑等五色。人们正是运用这五种颜色,或施嫁接,或行从植,可以把盆景打扮得千姿百态、五颜六色。在五种颜色中黑石榴最珍贵。

6. 葛粉

《镜花缘》中百名才女在下府凝翠馆行令吃酒,尽欢尽量。正当一部分人打盹睡、醉意重重,甚至酩酊大醉,而大多数人都觉得酒已足量,不敢再吃的情形下,作者急人所需,端上了云台山葛粉,壮众才女吃酒之胆。孟玉笋问潘丽春:“请教姐姐,假如今日多吃几杯,明日吃什么可以解酒?”丽春道:“葛根最解酒毒,葛粉尤妙。此物汶山山谷及洋鼎之间最多。据妹子所见:惟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冬月土人采根做粉货卖,但往往杂以豆粉;惟向彼处僧道买之,方得其真。”(九十一回)葛,又名鸡齐、黄斤,



属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葛通身是宝,其叶、蔓(藤)、花、谷(籽)、根,都可入药,历来在中医药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葛根药用更广,据现代临床经验报道:它对治疗高血压颈项痛,冠心病心绞痛,早期突发性耳聋,都有明显疗效。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葛根主治消渴身大热,开胃下食,解酒毒,作粉尤妙。葛谷解酒毒,葛花消酒。还有配方若干,其中有酒醉不醒,生葛根汁饮二升便愈,葛花细末入酒,常饮不醉等说。

葛粉是云台山一宝,山区群众公认葛粉能清温解毒,润肺化痰,止血补气。习惯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和糖沸水冲饮,一般用于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痰多咳不出,只喝半斤把就可见效,开始是痰稀能咳出,不几天就能无痰病除。一种吃法是油炸,用于年轻人咳血。把葛粉水淘掺糖搅成糊状,油炸成小圆子,每天早晚各吃一次,连吃几天咳血就能止住。据老年人反映,有时葛粉比青霉素还灵。

7. 海州辣黄酒

《镜花缘》九十六回中写了全国五十五种名酒,海州辣黄酒位居其间第三十二位,属中等水平。但其独特之处是既辣又黄。从酒的制作方法上分,有两大类:一是蒸馏酒,如高粱酒、烧酒,一般都为白酒或辣酒;一是非蒸馏酒,如绍兴酒、葡萄酒。从酒的规格上看,一般的常规是38度以上为辣酒,38度以下叫低度酒,如米酒、黄酒和各种果子酒(露)等。从这个角度看海州辣黄酒,颜色必然是黄的而且又是38度以上辣的。

《镜花缘》传说的基本内容

1、百花仙子传说。在这个传说里,百花仙子与嫦娥结下了怨恨,嫦娥便唆使下凡的心月狐到人间去压制百花,让其在腊月开放,导致玉皇让百花全部下凡,重修仙籍,演出了一幕镜花水月的人间喜剧。

2、阴阳镜传说。玉帝身边一童子趁玉帝不在,偷出阴阳宝镜,与醉仙和凌波仙子下凡,后来玉帝误步魔界,幸亏醉仙拼死救出,最终醉仙死在凡间。凌波仙子也留下陪伴知己。

3、《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生平传说。李汝珍出

生、早慧、随兄来灌、娶妻许氏、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当官治水、写作名著等多个传说。

4、印书趣事传说:此传说写李汝珍印书途中,遇偷抄者偷去文稿,导致盗版书横行,只得打官司的故事。

5、《镜花缘》和古代神话传说。名著《镜花缘》中,有大量奇人异民的海外国家叙述,这与《山海经》中的《海外经》在灌云县的传说多有印证。

6、老渔民与多九公的传说。在名著《镜花缘》中,多九公是一个航海家,与灌云人民濒海居住、以打鱼为生、经常下海行船密切相关,如今海边渔村仍有许多老渔民航海的传说。

7、民间《长人》传说。灌云的民间传说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这人光肚子就有天高,人不知多长。名著《镜花缘》第二十回里,也记述了一个长人的故事,讲几个老翁在一起闲聊谁见过最长的人。从这个惊人的相似可以看出,小说与传说具有的血肉联系。

8、《镜花缘》与民间传说《赔偿》。在灌云民间传说里,有一个关于赔偿故事:张三打死了李四家的一只鸡,张要赔一只鸡的价钱,李四不让,说自家的鸡生蛋,蛋出鸡,最后也是鸡鸭成群,牛马成行,怎么能仅赔一只鸡钱呢。在《镜花缘》六十四回里,也记载了一个叫卞俗的贫士,要把他家里仅有的两只鸡鸭卖了,可是他妻子坚决反对。说:“将来起家立业,全要在他们身上。”后来“不知不觉到了春天。鸡子抱窝时共积下鸡蛋二十个,鸭蛋二十个;将鸡蛋给鸡抱了,鸭蛋也用火炕了。过了二十余日,四十个全都抱出。夫妻两个甚是欢喜。再后就是鸡鸭成群,牛马成行。”可以说,民间传说是作者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

(作者崔月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兆元,原市民俗博物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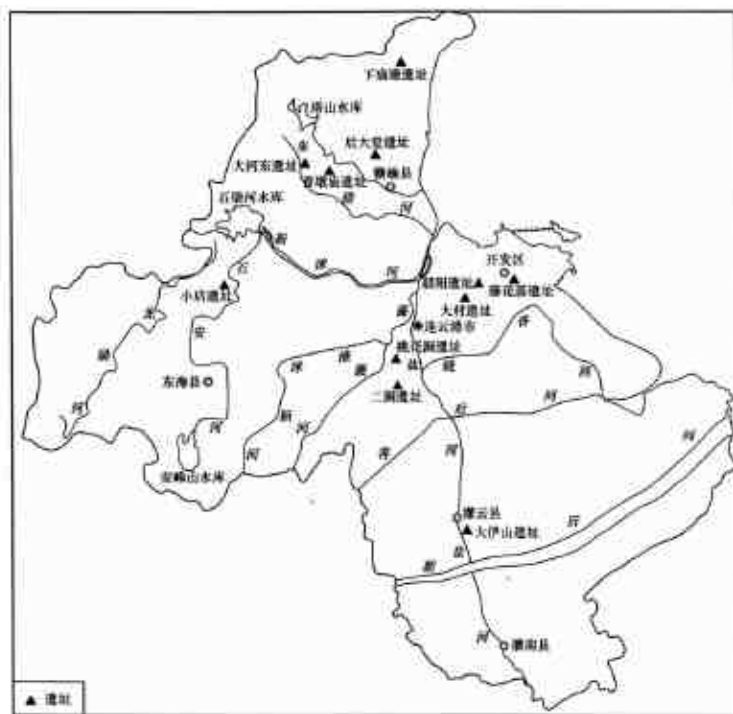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三)

——新石器时代(下)

刘凤桂



连云港市新石器遗址分布图

连云港地区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在藤花落、二涧、大村、下庙墩、后大堂、青墩庙等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藤花落遗址和下庙墩遗址。前者在于它是一处典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后者则是被考古界最早确认的我市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两

处遗址都从地层上解决了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前后承接关系问题。

由南京博物院与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编著的《藤花落——连云港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于2014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揭示,藤花落典型龙山文化聚落城址的始建前年代为龙山文化早期,开始修建年代为龙山文化早期偏晚,使用及废弃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期偏晚。以上三个时期对应的考古学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4400、4300、4200—4000年。龙山文化城址虽然在邻近我市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五莲丹土等地多有发现,但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进行揭示,这在21世纪初尚属全国首次。它所揭示的史前文化状貌涉及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布局、结构、功能等多

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内外两重的城垣结构、城壕以及版夯结合的筑墙技术;内城外大面积的稻作农田、农业排灌系统的设置;内城内东西与南北纵横交叉的公共道路以及通向城门口的对外交通管理系统(杆栏式哨所)和内城排水系统的设置;内城内



按社会等级划分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房屋布局;宗教祭祀场所和氏族权力中心建筑的位置选择及建筑结构形式的特殊;具有风水学价值的建筑物朝向和城门朝向及其结构功能,等等,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所称赞。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前城址共发现 40 余座,除城墙外,均没有发现如此完整的城市布局。藤花落遗址是第一座!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藤花落遗址本身的重要发现,而是让中国史前城址考古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填补了中国史前城址内部平面布局和社会结构的研究,进行的大面积揭露的方法对全国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藤花落遗址的价值之一,是它显示出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奴隶制文明过渡的特征。遗址所揭示的文化现象表明,当时在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等级差距,社会群体出现分层,私有制已出现萌芽。如:居住空间的大小不等,且按这种不同等级划分居住区;在内城还设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的作坊区;建有从事原始宗教活动的祭坛和与甲骨文中的“京”字造型、内涵相一致的独立王宰建筑;有内含暖炕及内外套间的供氏族长老居住的面积达 100 多平方米的居宰建筑等。加之内城外大面积的稻作农田,说明社会分工不仅表现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而主持祭祀所需要的巫师,作为知识阶层的出现,说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出现了分工;原始宗教——其表现形式是祭祀仪礼和原始歌舞——成为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用于战争防御或防洪需要的城防系统和内外连贯的交通系统的形成,则说明藤花落古城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及管理军队的军事首领人物,而居住在“京”字型房屋中的人则是集行政管理与军事首领于一身的氏族部落酋长,他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所有这些反映出由于社会分层的加剧而导致国家雏形的出现——历史学家所称的“早期国家形态”。恩格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成为必要。”“在新的城防城市的

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敌,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地,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古文献《吕氏春秋》也记载有“蜃筑城”,蜃的时代正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这与藤花落的时代基本一致,藤花落先民当时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局的前夜,文明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他们的家园。

藤花落的价值之二,是它显示出有别于其他中国早期城市内部布局的特殊性,即以纵横两条人工修筑的道路来分割城市的住宅区和不同的城市功能区,这一点与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大不相同。诵读发掘报告,它所具有的早期的城市功能竟是那样的完备,用今天的话来说,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相得益彰。如大型祭坛以及祭坛前红烧土块垫筑的广场,作为氏族集体祭祀活动中心,它满足了人们宗教活动的空间需要,而成为当时的标志性建筑,是实用和审美的统一、氏族精神需求与物质条件的统一。藤花落古城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功能,使它成为连云港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形和现代连云港城市的历史源头。其鼎盛期距今在 4200 年左右。

藤花落的价值之三,在于城址西北角外城与内城之间发现了稻作遗迹,有水沟、水塘、水田等与原始稻作农业有关的遗存,出土了岳石文化时期碳化稻粒,经鉴定为原始粳稻,是人类对野牛粳稻进行长期人工驯化栽培而获得的品种,与现代云台山地区栽种的粳稻已十分接近,这就把我市粳稻栽培种植的历史提前到 3700 多年前,这在中国农耕史和水稻栽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由于岳石文化环境作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晚环境遗迹(距今约 3600 年),拉近了稻作农业由中国东部沿海传入日本九州(绳纹时代晚期,距今约 3400 年)的时间差距,为研究包括连云港在内的中国黄淮东部和山东半岛一带的稻作文化与日本绳纹时代的稻作农业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藤花落的价值之四,在于揭示了它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中真正起负面作用的是生态环境因素,



而非战争或其他突发的自然灾害。据考古发掘报告称,遗址地层未发现底栖有孔虫等与海相沉积有关的沉积物,因而排除了海侵的可能。环境考古学研究结论认为,从大环境看,遗址的最终废弃可能与当时该地区长期处于一种过湿的积水或湿地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也不适合农作物水稻等的生长有关,使得先民们不得不选择废弃。有的专家还认为,为防止海水倒灌和抗洪,采用双城墙结构的修造,夯土中使用的超大量原木桩(据笔者初步估算,需70万棵木桩)皆从附近的山上砍伐而来,这就势必造成小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致水土流失,山体土壤保水功能失去,最易造成频繁的山洪暴发。因而可以说,藤花落曾经的辉煌含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为因素,而环境的最终破坏和生态的失衡必将祸及人类自身!这对当代的连云港人也是一个警示。

藤花落的价值之五,发掘资料证实,龙山文化晚期藤花落古城被弃置,时间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层关系表现为龙山期的外城墙壕沟被岳石文化的环境打破,而岳石期的碳14校正数据为距今约3700—3600年左右。证明300多年之后,岳石文化先民曾来此经营农耕,但不久又选择放弃。从而表明在连云港地区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在赣榆县城北18公里的盐仓城西隅发现下

庙墩遗址。经过探沟试掘,出土了一处当时被认为是单一的龙山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初,经中国社科院山东考古所的专家对发掘材料重新梳理,发现出土器物中的平底黑陶尊形器、鸡冠耳盆(残片)、蘑菇形柄器盖等具有岳石文化典型器物的特征。后来,1985年国家文物局编辑出版的《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将其归入岳石文化范畴,并认为该遗址提供了打破龙山文化灰坑的“层位线索”。岳石文化遗存在其他地点也有发现,如二涧第一次试掘出土的折腹红陶鼎、印纹陶片、朝阳出土的黑陶片等。

龙山文化的衰落,标志着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连云港在内的鲁东南和苏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在即将跨入文明的门槛时却止步了,之后相隔近300年的岳石文化先民也没有把社会形态推向更高的文明。(按:岳石文化的考古学年代数据为距今3900—3500年,故它是与中原地区已经步入奴隶制时代的夏代文化在时间上是基本同步的,但它与中原地区的夏文化不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而是始终保持自身传统的一种地域文化。从连云港地区看,岳石文化的去向可能已越夏代延续至商代早期。)

通过上述论述,得出的结论是:连云港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年代为距今10000—3500年。

(作者单位:购海书院)

责任编辑 于冰清

附:连云港地区史前时代年代数据表

文化名称	年代数据	典型遗址(或地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细石器文化	距今2~3万年至1万年	桃花洞、将军崖、大贤庄、爪墩、何山头、南山、石碑、范顶子
后李—北辛文化	距今10000~6500年左右	二涧、大村、朝阳、藤花落
大汶口文化	距今6500~4500年左右	大伊山、青湖、大河东
龙山文化	距今4500~4000年左右	藤花落、二涧、大村、青墩庙、后大堂
岳石文化	距今3700~3500年左右	藤花落、下庙墩、二涧



沈云沛、袁世凯 与清末邮传部

刘成文

邮传部是清末官制改革的产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需先厘定官制”的认识下对部院进行了大改组。将原有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刑部改为法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同时增设了邮传部,统辖铁路、轮船、电政、邮政。《清实录》记载:“拨民政部公用处地址,归邮传部改建衙门,从邮传部尚书陈璧等请也。”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八日,邮传部迁入新衙办公。

邮传部的成立主要是为了迎合晚清政府交通发展的需要。因此,邮传部承担了建设和发展中国交通、邮电事业的重任。在铁路方面,主要致力于铁路的统筹规划、建设、发展、营运等。在航运方面,邮传部的举措有调查、制定规章等,推动了内河、外洋航运业的发展。在邮政方面,主要进行调查、统计、计划,且制定政策与规章,努力发展邮电事业。除此以外,邮传部还在汽车、电灯、无线电及航空等方面有所作为。

就清政府而言,邮传部的成立显然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尽管推动交通发展也是其目的,但主要是服务其统治。

邮传部的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海州人沈云沛署理(代理)邮传部右侍郎(相当于第二副部长)。宣统二年(1910)七月,升任左侍郎(第一副部长),署理尚书(代理部长)。宣统三年(1911)六月,改任弼德院

顾问大臣。

自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宣统三年十一月(1906—1911),不到6年间,邮传部尚书一职13次易人,任期最长者一年零八个月,最短者仅一个月。沈云沛在邮传部担任重要领导达三年多时间,可以称之为元老级人物了。

袁世凯对邮传部的控制

袁世凯与交通行业尤其是铁路的关系十分密切,交通及其管理部门,特别是邮传部一直受到袁世凯的遥控,“该部一直是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瑞德《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早在邮传部成立之前,袁世凯就身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直接控制着铁路建设有关事宜。当时中国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主持,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被裁撤后,商部名义上接管了全国行政,“但由于早已完工的关内外铁路及拟议中即将修筑的津镇(浦)路与正在修筑的京张路,均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而已经完工的京汉路与正在加紧修筑的沪宁路,则在唐氏(唐绍仪)的控制之下;所以,商部综理全国路政的权威,实系有名无实。”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唐绍仪接替盛宣怀出任沪宁铁路大臣,则彰显着袁世凯在铁路领域中的势力。

邮传部初期的主要人物是张百熙、林绍年与岑春煊三位尚书。张百熙是邮传部的首任尚书,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常亲密。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娶张百



熙的女儿为妻。张百熙得以出任邮传部首任尚书，就是由于袁世凯的举荐。

邮传部中期的主要人物是陈璧与徐世昌。陈璧亦属于袁世凯系，他被免职就是因为袁世凯当政后袁世凯被贬。陈璧被革职次日，即宣统元年一月十九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授予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之所以去总督而归任邮传部尚书，与袁世凯被贬率也有关。“世昌与世凯关系密切，沆瀣已久。袁既被排，势将及己，心中不无惴惴，适值邮传部尚书缺出，徐世昌又坚决去位，故遂调补此缺。”

邮传部后期的主要人物是唐绍仪与盛宣怀。唐绍仪倍受重用，也得得益于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说，唐实际上就是袁的代理人之一（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

沈云沛得袁世凯的举荐

沈云沛之所以能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从农工商部右丞任上晋升任邮传部右侍郎，主要得力于袁世凯。

这里不能不提他们之间的中间人——杨十琦。杨十琦（1862—1918），字杏城，江苏盱眙县人，他的祖父杨殿邦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官任漕运总督，父亲杨鸿福“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也就是说，杨十琦亲兄弟八人，其中除三人未成年去世，其他五人都中过科举。他们分别是老大杨十馨（光绪甲午进士）、老三杨十晟（光绪壬辰进士）、老四杨十驥（光绪丙戌进士）、老五杨十琦（光绪壬午举人），老八杨十驥（光绪癸巳举人）。五人中，老四杨十驥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任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直隶总督。杨十琦则是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参与了逼迫清朝退位，拥戴袁世凯称帝，被袁视为心腹，素称“智囊”，官至政事堂左丞。袁世凯的三女儿（袁叔桢，后改名袁静雪）嫁给了杨十琦的侄子杨毓珣。而沈云沛的儿子沈蕃（家族排行沈十三）娶的是杨十琦的女儿，因此，沈云沛与杨十琦是亲家。

杨十琦家族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则不仅仅是亲戚关系，更可以说是生死之交。袁世凯一生中

危险的时刻是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后，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传说，光绪临死前，对载沣遗言就是除掉戊戌变法期间出卖自己的袁世凯。那时候的袁世凯如同丧家之犬，连夜逃亡。送他出京城进入法租界的就是杨十琦弟弟。时任京津铁路督办的老八杨十驥。杨十驥得知后，派他的儿子两次到法租界找袁世凯，劝他能冒险回京，这样才不会给对手留下借口。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回京活动，竟然保住了一条命。最后被撤掉职务，责令回老家彰德养病，这也为他在武昌起义后东山再起创造了机会。

因为有这段经历，袁世凯对杨家弟兄一直信任有加。杨十琦参与了袁世凯很多秘密活动，是他最为重要的心腹。如为了结交当时的权贵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就派杨十琦送上了十万两的银票一张。此后，每逢年节或是庆王府的红白喜事，袁世凯都会派杨十琦奉上不菲的银子。

杨十琦也以善于赏拔人才为世人所称许，据《新语林》记载：“杨杏城（杨十琦）好奖人才，为农工商部侍郎时，属官中东海沈雨人（沈云沛）、湘潭袁伯夔、南丰赵仲官、如皋冒鹤亭、常熟邵厚甫不惜齿牙为揄扬。”沈云沛与杨十琦既是上下级关系，更是苏北老乡，后来又结成了亲家，因此，杨十琦对沈云沛的推荐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沈云沛在邮传部历任右侍郎、左侍郎，甚至还代理过5个月的尚书职务。他之所以能代理尚书，和庆亲王奕劻也有一定的关系。1910年，邮传部尚书一职空缺，当时清廷提议唐绍仪为邮传部尚书，但直到9月才莅任，其间暂时署理者即为沈云沛。此中原因，“系为授缺后即被人纠参，故未便莅任，一俟朝廷查办后如何办理，再作区处。”（《唐尚书到任原因》，《盛京时报》1910年9月6日）也就是唐绍仪刚要上任，还没有正式文件，就有人向朝廷举报他，唐绍仪被迫等待查实再说。此时，老奸巨猾、素有巨贪之称的奕劻便放出口风，邮传部尚书职位售银三十万两。此时，另一个实权人物盛宣怀想顶替沈云沛当上尚书，他觊觎这个肥缺已达十余年之久。奕劻知道盛宣怀身价丰厚，答复是：“别人



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两不可。”后来盛宣怀托人说情砍价,奕劻才答应以三十万出售这顶乌纱,但要求“须交现金,不收他物”。当时的情形是“军机处单开四人,第一盛(宣怀),第二瑞良,第三沈云沛,第四未详”(《盛宣保离京原因再志》)。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询问四人中应选何人为官,奕劻力推盛宣怀。结果,沈云沛因行贿的实力不如别人,而与尚书职位擦肩而过。

沈云沛对袁世凯的回报

沈云沛因杨士琦的关系而得到袁世凯赏识,并且在邮传部地位稳中有升,因此,沈云沛对袁世凯也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据《清实录》记载:“宣统二年正月,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画策。”(第60卷,538页)

当然,沈云沛在邮传部期间,也为家乡连云港作了很多的贡献,这一点在历史上不可否认。尤其是他力主将当时的汴徐铁路东端延伸至连云港,从而为今天的陇海铁路乃至亚欧大陆桥奠定了基础。1913年3月,陇海铁路分别以徐州、开封为东西端点,同时相向施工。1915年5月,徐州至洛阳之间铁路全线贯通。沈云沛提出的连云港、日照、燕尾港三港共建,带动中国腹部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到今天仍然很有借鉴意义。同时,他又是国内有名的实业家,建设洪门果园、开垦沿海荒滩、试验农业新品种、创立云台山树艺公司等,与南通张謇、赣榆许鼎霖被上海报界并誉为“江北三名流”。

在政治上,沈云沛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知恩图报。袁世凯密谋登基期间,沈云沛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合作,为袁世凯继续出谋划策。据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回忆:“(袁克定)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来往,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政事堂方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八十三天皇帝梦》)

1915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五年,在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袁世凯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想当皇帝。他又一次演出了很多独裁者“谦让”的假戏,不强行称帝,而是让手下“真心实意”拥戴他当皇帝。9月19日,曾经担任讨邮传部大臣(即尚书)的梁士诒为表忠心,拉了一帮人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推举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到各省串联,要求大总统“以正大位”,声势浩大。

据当时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说:“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几种人,一是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太子位,继承大统;一为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与子孙荣爵;一为满清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一作复清之地步……”(《近代史资料》)沈云沛就属于其中的第二种,他是长期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人,在他的头脑中熟背的是《四书五经》的教条,很少有现代的民主思想,他曾经写过一句诗来嘲笑当时的革命党人:“蛙声一呼井中天”,诗中把革命党人比作坐井观天的青蛙。同时,担任全国请愿会会长,也是为了报答袁世凯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仪式,宣告中国国体由共和制改为君主立宪制,袁世凯担任第一任皇帝,是为“洪宪”皇帝。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随即,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袁运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两年后,1918年8月8日,沈云沛在北京病逝。邮传部早在民国成立起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为交通部、邮政所、铁道部等所取代。

(作者系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督查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王规祖孙在朱麻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二

伏广喜 闫祥富 杨庆昌



清《云台山志》诸麻村图

朱麻(诸麻)是东路镇湖南西数最后一个村子。从清张才甫的《云台补遗》中可知该村其时的概貌：“村壑逶迤，冈峦峭峭，落叶满谷，不见人迹。”好清幽、静雅的一个村子。民国诗人张百川的《云台导游诗钞》所呈现的也是一幅恬淡、典雅的村居画面：“林深十里隔红尘，芳草如烟望不真。雨过豆棚三径话，风来麦陇几家春。花村门少催租吏，茅屋田多剪韭人。扫榻留宾供晚饭，盘中佳味压蔬蕕。”明顾乾的“云台三十景”之“孤村茅店”就取自这个村。他所描绘的“青帘招飏，茅屋萧疏”景致，所体现的正是元人马致远笔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那种意境。

这个地处深山的小村子，看似平常，却走出了两位在云台山乃至古海州历史上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明洪武年间大理寺评事王规、明正统己未(1439)科讲学王璟。

王规，明洪武年间人。其始迁祖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在海州任郡丞司马的王珥。在淳祐十二年(1252)前，一直在海州守军任职。南宋灭亡后，元朝建立。在讲退无路的情况下，王珥举家迁往时孤悬海上的云台山。自此，王氏宗族定居云台山。王规为洪武癸酉(1393)举人，后参加讲学考试，未捷。不久，受地方举荐，出任大理寺评事。这大理寺为我国旧时国家审判机关，始设于南北朝，止于清。其职责是审核刑狱案。它与提起奏劾的御史台和管理司法行政



政的都司尚书合称三法司。可见这大理寺为朝廷的要害机关。王规在大理寺所任的评事一职,相当于汉时的廷尉,与今天最高法院的审判长职务差不多,专司判案。这一职务虽不是太高,却相当有实权。但王规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从不乱用,而是以伸张正义和服务百姓苍生为宗旨。在这方面,《江南通志》对他有较高的评价,称“有清理之誉”。其时的云台山南,还被海水包围着,山脚下的农田、盐田时常遭受海水冲刷、浸泡,农、灶民苦不堪言。从云台山南走出的王规,深知家乡父老的苦处,决定上书朝廷,建议沿云台山南筑一条捍海长堰。这条捍海堰是史书上记载的最长、规格最高、投资最高的一条海堤。它“起大岛,西抵凤凰城东,东西 50 里。”(李普元《东海志》)从南城到大岛山,弯弯曲曲,环绕了半个云台山。王规的奏折获准后,朝廷责成相关部门会同海州府及时组织规划施工。其堰筑成后,它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想而知。无怪乎《江南通志》称多少年后,还“乡人德之”。王规此举对明代海州后来的海堤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如:洪武二十七年,重筑万金坝、新筑官河坝、沙湾河坝;成化年间(1465—1487),筑朱麻四庄坍塌;弘治十六年(1503),筑万金坝;嘉靖八年(1529),三筑万金坝及二十孔桥;万历元年(1573),四筑万金坝;万历十三年(1586),筑大村堰;万历四十五年(1617),筑杨公堤;天启二年(1622),杨公堤改筑刘公堤。在大理寺之后,王规转任山东布政司参议。在山东,他的“清明之政,循良之迹”,同样“脍炙人口”。(《降庆海州志》)

王璟,明正德己未(1439)科进士。王璟有一段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是军户子弟,父亲王立本为在籍军人。元明之际,海州境内军户原为元朝垛集军户,明时转为屯守军户。明朝对军户家庭有一条规定,即该家庭累世有子弟入伍之役。并且规定,其子弟不得经商务农,甚至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直到明永乐年间(1403—1424),这项政策才有松动,王璟得以报名获准参考。这位贫寒学子,“少承家学,博及群书”,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一考即考得被皇上钦点的进士身份。他是全明朝海州仅有的 5 名进士之一,又是明朝开朝后诞生的首名进士。王璟不仅才高八斗,还和他的叔祖父兼授业师王规一样,是一位心系黎民,乐为天下苍生办实事的官员。据《江南通志》载,当时海州百姓养官马甚苦。这项累及万家的负担史称马政,即军队所需之马均由百姓所供养。朝廷规定,每户每年所养之马必须在 30—100 匹之间。其中有一匹无偿提供军用。此项规定在元、明时期一直都被无条件地执行着。有着农户、军户双重身份的王璟,对此规定早就心存不平,入仕之后,王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绘图加注的方式,上书朝廷,要求朝廷废除这项“天下公害”。从史书上看,他的奏折获准后,不仅是海州的百姓,全国深受马政之苦的家庭都对他感激不尽。正像《降庆海州志》所说的“遗爱旧德,至今赖之不衰”。庆幸的是,我市东海张湾,还有一片王璟后人聚集地。明清之际,那里建有大夫第和王规墓。那里的王氏堂号为继美堂,是取继承先祖之美德之意。

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朱麻村民对王规、王璟的名字依然耳熟能详。如果问起这对明代祖孙故居所在位置,大多数人都能指出大概位置。现村中两户陈姓家庭所建楼房处即为具体位置,1959 年人民公社时期,此处为一个生产队的牛房。在牛房之前,则是一片空旷之地。生产队犁地时常会犁出陈旧的青砖。在王规祖孙故居位置西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面东。据传此山上一个叫红石洞的地方为王规、王璟读书处。现今,只剩下一片不完整的墙基。由于王规、王璟曾留迹于此,此处的山头乃至山下的村庄,人们都称之为上学堂。

朱麻村最大的地域特征是山多,可说是东西南北皆有山。这里的山总名叫朱麻山,海拔 222 米,面积 130 公顷,由 6 个山头组成。具体为:山撵子,又名笔架山,因在朱麻村西,又有朱麻西山之称。山撵子有两个小山头,海拔分别为 190 米和 187 米。该山东南有块猪嘴石,又称为猪嘴山。上学堂,在村北,海拔 195 米,即王规祖孙读书之山,此方面情



况不再复述。团山,在卜学堂东,因山体团而得名,海拔160米。大顶,在朱麻村正北,为诸麻山主峰,山顶以赤松、麻栎及阔叶杂树为主。二顶,在大顶东,海拔162米。石虎嘴,在一顶东,海拔35米,顶卜多松。在朱麻村,还有两个独立的山体。一为大岛山,二为小岛山。大岛山,海拔217米,与朱麻山主峰大顶比肩。其还有一座子山——凤凰嘴,海拔18米。其西北高,东南低,山体总面积93公顷。小岛山,位于大岛山西南约1.5千米。海拔62米,山体面积10公顷。在清《云台山志》中被称为金蝉大岛、金蝉小岛。从明顾乾的《云台山志》上可知,其时的大、小岛山四周为潮间带,“潮牛则没其麓。”清黄申璋的“云台二十四景”将其命名为“潮吞双岛”,“(东磊正殿)平台前望,海面20里许,有双石对峙如门状,若虾蟆……潮汐拥门而入,其势如吞,最可观也。”海退之后,这里一度成为沿海滩涂。

从1958到1965年,大岛山东滩地有过短暂的辉煌。当时,县、乡两级共投资41万元,每日组织56名劳力,共投工1.3万个,开挖引潮河1条计1.7千米,排淡河3条计4.2千米,筑圩堤3条计4.6千米,整盐滩935廛。开发总面积176公顷,其中生产面积达到173.3公顷。大岛山盐场当时是灌云县乡镇盐场中规模最大、年产量最高的场子,1959—1964年间,连续受到灌云县政府表彰,还4次受到省盐务局和省轻工厅年度表彰。1965年5月,国家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局长杨言德来此视察时给予较高评价:“小盐场管理得好,也能取得高产量,乃为社办盐场之典范。”1966年文革开始,盐池废弃。后经不断的改良开发,大、小岛山四周又成为一望无际的良田。

朱麻山主峰大顶脚下一片巨大的裸岩处,为《江南通志》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上载录的《耕牛护主》故事背景地。此故事在海州也广为流传。古文献刊录的与民间流传的内容大体相同。大意为:从前,有一个农民夜宿田埂间,有一只老虎要来吃他。陪在他身边的一头微牛拼命护着他,用两只利角与老虎展开生死搏斗。这个睡熟了的农民听到乒

乓乒乒的声音,以为是他的微牛在捣乱,便用吊鞭猛抽微牛。然后,又昏昏睡去。等天亮了,农民见到这头跟随他多年的微牛浑身是伤,血迹斑斑,已死亡多时。再看一下周围,留下很多牛、虎混杂的蹄印。他这才醒悟,原来自己睡梦中听到的声音,是牛虎相搏发出的声音。耕牛肯定是与老虎搏斗力竭而亡。想到这里,他痛哭不已,为悼念这头忠诚的牛,农户在自己的田边建了一座耕牛庙。该庙正式启用那天,他请人撰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牛为我役,我为牛主。我牛幼时,亲经调理。天或寒坎,置于燥地。时或饥坎,供以草具。旦摩暮抚,已去复视。头角峥嵘,供我农事。幸而之牛,嗟尔之死。既非喘月,又非衅僮。猛虎出岫,欲啖其主。非尔在旁,我其死矣。幸尔在旁,尽力以抵。及旦视之,虎败尔死。呜呼,蠢兽尚知德,可以人不知。山阴立庙堂,祭祀增歆噍。”这则故事最早记载在《江南通志》上,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考证“以为宋代事”。

朱麻村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唐王李世民带薛仁贵跨海东征曾路过这里。淮海锣鼓《薛仁贵救驾》那一出戏里“大唐王淤泥河里喊贤至,薛仁贵一枪挑起两条龙”的唱段说的就是紧挨这里的五羊湖。因当时有大批马队驻守,这里便留下“驻马”的名字。时间长了,人们说成了今日的朱麻。另一传说说南宋大文人朱熹和神仙麻姑同伴于此,当时人们便将两个人的姓合在一起作村名,便成了今天的朱麻之名。这些虽然都是传说,但历史上朱麻作为军事要地却是千真万确。汉、唐时期这里有官兵驻扎。山撵子山西麓有宋代招信军留下的石刻。清代,曾为东海黄江墩汛点之一,每日有3名汛兵在此巡逻。

责任编辑 于冰洁



报社生活琐忆

韩世泳

转眼间,离开市报社已42个年头。然而,那儿毕竟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调去,而且一干就是15年的地方。那15年间,特别是市报创刊之初的一些事儿,时不时还会冒到眼前,久久不肯退去。

一纸调令到报社

1958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心想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都投入了“大跃进”的洪流。当时有句很流行的口号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我还就碰到了“想不到”的事。

当年,我刚从东海师范(后称海州师范)毕业半年,在经历了极短暂的学校工作和全市中小学教师集中(于新海中学)整风学习后,被抽出参加全市教师扫盲大队,奉命带着一个由六十名老师组成的扫盲小队,开赴花果山下云台人民公社去扫盲。当时的云台人民公社是一个大社,包括现在海州区的花果山街道、连云区的朝阳街道、中云街道、云山街道、宿城街道和东西连岛、高公岛,公社驻地在新县(今朝阳)。我们小队被公社文教助理赵绍燕分配到花果山水利工地上去教社员识字。经过个把月“跃进”,我们队便提前完成了任务。在向公社报喜后又被调到云山大队去扫盲。云山大队坐落在北云台山南麓,10多个生产队分布在一溜山根,东西长约20里,素有“中云一大片,云山一条线”之说。从水利工地来到山根,生活环境是变好了,可扫盲的难度却加大了数倍。大约过了个把月,我们小队又奉命去宿城大队(今连云区宿城街道)扫盲。这天,我们翻过虎口岭,来到世外桃源——宿城。经询问,

我们来到大队部办公室,可刚进门还没来得及汇报情况,大队一个同志就对我说,市扫盲大队来电话,让我立即回公社交接工作,到市文教局去报到,什么事电话里没说。于是,我马上背起背包,再翻虎口岭,从云山步行几十里赶到新县。本打算和赵助理说一声就赶回新浦的,谁知赵助理却把我留下帮了一天忙。

第二天,1958年4月12日中午,我背着背包从新县步行赶到了新浦。走进市文教局办公室时,一位大我几岁的男同志(后得知此人为朱秀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刚要解释迟到一天的原因,他倒先说:“小韩,你别急,赵助理来电话跟我说了。”接着,对我说,“现在全市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宣传工作也在大跃进,市里已于今年3月1日创办了《新海连市报》。现在报社人手奇缺,市委宣传部决定把你调到报社去工作,希望你去了好好干。报社要人很急,你的调令昨天已开出,让王素芬同志先拿去报到了。”

那个年代,人们的工作是绝对服从分配的,组织上叫干什么就无条件地去干什么,而且要一心一意地干好。就这样,一纸调令,让我这个学了三年师范、刚刚踏上教育战线的“小老师”,一下子就讲了对其一窍不通的报社。

记忆中的报社大院

离开市文教局,便按局办公室同志的指点去报社报到。

沿民主路东行不远来到一个“丁”字路口,向北





1958.3—1973.1 连云港日报社院落示意图

一望,见有“第一池”大楼,由此北行,在“第一池”北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向右拐,路南有座两层楼,这便是刚成立的新海连市报社所在地。

报社的楼从外看体量不大,但那时在这一带的低矮平房中也可算是“鹤立鸡群”了。因此,当时人们俗称“报社大楼”。这栋楼原是新浦大粮商林梓周家的院宅,公称“林家大楼”。1939年春,日本侵略军侵占海州地区后,将新浦十家大粮商组成“海州华商粮谷组合”,林梓周为“组合”头子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家大楼”成为农业银行用房。解放后,新海连特委曾在这里办过建国学校,后来转作他用,今又成为新海连市报社用房。之后十多年在此讲讲出出,报社大院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报社坐落于陇西路南侧,为两层楼,上下各4间。底层东边一间为走廊,拱形门,厚厚的墙下,下着两扇沉重的实木大门,推动时吱吱作响。

进了大门,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院落:院西侧是一排上下各4间的两层楼。此楼的北山墙对着沿街门面楼西头2间,中间是两楼共享的楼梯道。两楼相连呈“L”形,两楼外走廊相互连通。走廊外沿由多根小盆口粗的楠木柱支撑着,护栏由一根根立

枋组成,全部漆成松绿色,使院落平添几分宁静。这两座楼房,除西楼南头楼下两间为时兼报社总编的谭学宏部长家居住外,其他都是编辑部用房。

院子东边一排平房很矮,檐口只有一人多高(后为食堂)。院子东北角为简易男、女厕所。厕所南不远处是两间小平房(曾为职工宿舍)。

这就是1958年春我刚去时的报社大院。

不久,报社自办印刷厂,大院又多了个南小院。南小院的北边一排平房瓦屋,介于报社两个院落中间。瓦屋较高大,其靠西山墙的两间还穿了小楼阁,只是楼上太矮,人无法直立。小楼阁下东一间为走廊,小楼阁东边几间平房是印刷车间。小院东侧一排高大平房为拣字、排版车间,西边两间平房为校对室。报社大门走廊西首楼下那两间屋,一度就成了堆纸的仓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适应发展需要,报社翻建了印刷厂,拣字、排版、印刷都在一排高大的坐东朝西的大车间里。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很好发挥作用。1970年夏,新浦发大水,到处是一片汪洋,很多民居倒塌,报社印刷厂的新大车间和编辑部都成了受灾群众的临时安身之处。文化大革命后期,大车间又成了我们这些参加“学习班”的“老报人”的集体宿舍,车间四周都铺满了地铺,直至1973年初报纸停办,大多数同志另行分配工作,各奔前程为止。

入门导师张学贤

1958年4月12日,我到报社报到时,见到的第一位同志是闵次章。他是安徽人,中等身材,红黧黧的方脸,待人平和。老闵同志告诉我,我的介绍信他已收到。没用几分钟办好报到手续后,他把我带到编辑部。

编辑部也在二楼,和我报到的那间办公室紧挨着,是北楼,分东西两口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是两间屋。我被领进了东头一口办公室。我朝里一望,只见屋里几张桌子上趴着的人都在忙着写东西,直到闵次章同志说:“老张,小韩同志来了!”才见靠东山



墙中间两张桌的面北而坐的一个同志站起来,转过身来说:“欢迎!欢迎!”

这时,我一眼便认出,站起来的那位高高个子的人,是我刚考上海师时的张学贤老师。他家住在海州城里塘巷,离我家200来米。我便随口叫了一声:“张老师!”张老师也笑着说:“小韩啊!报社刚办,欢迎你来一起干啊!”接着,把我介绍给室内几个同志,又向我介绍室内的几位同志,大家都热情地站起来向我表示欢迎,但都马上坐下忙开了,好似一分一秒对他们都是极其宝贵的。

据张学贤同志介绍,报社编辑部原有9个人,主要是从市委宣传部和淮北盐工报社抽调来的。他特别要我向来自淮北盐工报社的解伟民、来俊华、滕英等同志学习。听了介绍,我头皮都有点发麻,觉得自己对新闻工作一窍不通,担心跟不上。张学贤同志可能察觉到了这一点,鼓励我说:“小韩,好好学,没有学不会的!你现在什么也别考虑,先集中精力看报纸,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当即,我便在张学贤同志指导下,投入了讲报社后的第一项任务——看报纸,一看就看了两天。把屋里报架上刚出版一个多月的《新海连市报》《新华日报》和省内创刊的一些市县报都看了一遍。其间,张学贤同志也不时过来指点,告诉我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导语,什么是通讯,要我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被他带入了新闻战线。

接着,我开始跟编辑部的一些老同志接触,了解了报社编辑部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更感到报社工作的紧张繁忙,这里全不像学校工作那样按部就班。这里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编辑部的灯始终都是亮的。为了保证市报按时出版,杜总编和张学贤、解伟民等同志经常是整夜不合眼。

两天报纸看过后,张学贤同志又给我做了一次辅导,扼要地告诉我如何写新闻,下去采访要抓住几个要点,时间、地点、事情具体过程、结果、主要人物一定要问清楚,记住了。而后,他告诉我说,市委已决定5月1号市报要改为日报,要我赶快下去

熟悉熟悉,好早点投入“战斗”。

我的报社采访生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初次采访

刚开始采访时,没有固定在哪个组,主要根据编辑部需要,安排在市区采访一些不太紧要的事,实际上就是让我练练兵。

记得编辑部安排给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到新浦区去了解一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我拿老闵同志开给我的介绍信(那时报社没有记者证),根据文教组来俊华同志的指点,在民主路的海昌巷(今海昌北路)头东首找到新浦区人民委员会,先后拜访了区文卫科副科长刘永升同志、区委宣传科副科长宋振家同志和几个居民委员会干部。当时,报社没有自行车,找人了解情况全靠两条腿。人家听说我是市报社的,都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人家说什么,我就记什么,整整忙了大半天。回到编辑部也跟真事似的,拿出稿纸写了起来。实际上就把人家说的区里从上到下大跃进,大搞卫生的情况,事无巨细地罗列在纸上,忙了好几个小时,画了三四张稿纸。

稿子上交后,张学贤老师看了又看。他看时有点犯难的样子,但是他还是一边鼓励我,一边或拿着红水毛笔划,或拿钢笔在上边写着什么。改好后,还是鼓励我说:“不错,第一次写嘛,多写几次就行了。”并把改好的稿子给我,让我看看有没有改错的。我接讨稿子,一下呆了,几张稿纸上满是红线,间或留有几句原来的话,其他都是他重新写的。我原写的近两千字变成了二三百字。

当时,报社稿子紧张,没两天,署上我名字的这篇报道见报了,在报上占有豆腐干大的位置。我看了很高兴,更难为情。于是暗下决心,要好好学,好好练,不能老叫人家编辑费那么大大工夫帮我重写。

11人办日报

1958年4月,我到报社时,社会上“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作为市委宣传喉舌机关的报社,更



觉形势逼人。市报刚创刊个把月,根据市委决定,5月1日就要改为日报,每周要出六期,八开四版。

当时,报社编辑部只有11个人。其中,还包括2位领导和我们刚到报社的2个人。担子主要压在各口编采人员张学贤、解伟民、宋俊华、滕英、陈学燕(美术编辑)、李训敦(摄影)、闵次章等同志肩上。很明显,领导和各位编辑的压力非常之大。在平时,由9个人办八开四版日报,是无法想象的。但在那处处都要“敢想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只有11个人的编辑部,在杜庚副总编带领下,硬是挑起了市委交给的这副重担。从传达市委决定,到改出日报只有个把月时间,在这个把月中,编辑部的人没有上下班时间,也不分白天黑夜,人人都在忙碌着,在保证《新海连市报》正常出版的同时,大家抓紧组织稿件,特别是充分发挥市各委办局的党委宣传委员和秘书作用,请他们撰写各条战线“大跃进”情况的稿件,储备版面。终于在5月1日这天,印有红色报头的《新海连日报》创刊号,按时与全市人民见面了。市委对此表示非常满意。

改出日报后,市委感到报社人手少,压力太大。于5月中下旬给报社派来了罗长洲、薛辅一、李冀远、张应灵、张振民、刘熙、韩佛海等一批部队转业

干部。当年夏天,从省新华日报社调来的新任副总编袁汀同志到任。秋初,曾干过新闻工作的骆名伟及原来在市委宣传部做过理论教员的李伯如等同志也来到报社。第二年,又从东海师范提前毕业的学生中抽调邱绍玉、张善民等到报社工作。编辑部的人手不断增加,内设机构也不断完善。我被明确在农村组。农村组当时还有张学贤、骆名伟、王素芬,后来增加了周志明,王素芬又调到别组。但因新手多,一时难以独当一面,受累的还是原来那几位老同志。大家每天都是夜以继日地忙,日报依然常常是到当天上午才能付印。

针对这种情况,市委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办报之路,大力加强报社通讯员队伍建设工作。召开有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和行政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市通讯员大会,书记亲自动员,因此,报社通讯员工作大跃特跃,通讯员队伍由400人一下增加到4000人,各单位的负责同志都被发展为特约通讯员。记得当时农业方面的报道主要是靠市委农工部、农水局、水产局等单位的张坚、武心铎、王桓栋、张福林和农业技术员姜承喜、李家安等骨干通讯员撰写。编辑部对记者组织通讯员写稿,巩固发展通讯员队伍也有具体要求。我们到农村采访,都先和公社、大队的通讯员(他们大多是会计)联系,了解

情况,发现报道线索便和他们一道研究,首先约请他们写稿。有时他们写的稿子质量不行,就再次登门和写稿人共同研究,请他们改写,而不自己包改,不挫伤通讯员的积极性。和通讯员合写的稿件,刊用时也将通讯员的名字署于前边。群众工作的开展,大大缓解了编辑部人手不足之难。

(作者单位:海州区志办)

责任编辑 于冰洁



1998年《连云港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社农业组人员合影,左起:王素芬、张学贤、骆名伟、周志明、韩世泳



国地税分设亲历记

殷 然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实施,拉开了我国全面实施新税制的序幕。这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初的一个重大税制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分设两套税务机构。作为税务系统的一名干部,此次税制改革,笔者全程亲历,从分设,到如今已经走过21年,现将这次税制改革、特别是两套税务机构分设的相关情况记录如下:

两套税务机构组建的背景

1993年底至1994年上半年,我国的税制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中央要求实行分税制管理体制,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进一步理顺各级财权,调动各方积极性。对这场税收体制的深化改革,可以说,是推动我国经济改革、配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的、必要的措施。对此,尽快在全国各地组建、分设两套税务机构,迫在眉睫。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省、市政府相继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按规定尽快组建两套税务机构,以充分适应、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确保各项新税制法规、政策的落实。

1994年6月26日,连云港市税务局公布《关于组建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机构和地方税务局机构的实施意见》,对组建的依据、两套税务机构征管

税收的范围、两套税务机构名称和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领导职责、领导体制、两套税务机构之间的关系、现有人员、财产划分、经费来源等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要求市级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工作在当年7月底完成,县级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工作在当年8月底完成。

1994年7月8日,江苏省税务局对连云港市税务局上报的《关于组建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机构和地方税务局机构的实施意见》给予批复,同意我市组建两个税务机构的实施意见。并要求我市税务局向市政府上报组建各级地方税务局的实施意见,请求市政府审批。

1994年7月13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税务局上报的《关于组建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机构和地方税务局机构的实施意见》,要求尽快做好组建两套税务机构的工作,并确保组建工作顺利完成,我市两套税务机构的组建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994年8月18日,连云港市税务局组建国、地税机构筹备组在市税务培训中心(连云区墟沟镇)召开市区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动员大会。市区副科级以上税务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了关于国税、地税机构人员、财产、经费分配方案。

1994年9月15日,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成立大会(也称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大会)



在新浦明珠大酒店召开。省国地税的领导,市委书记郁家树、市长唐贯淮及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在会上,肖爱国被任命为市国家税务局首任党组书记、局长,刘厚明、邵荣生任副局长;张文武被任命为市地方税务局首任局长,祁迎福、秦玉萍为副局长。



连云港市国地税分设成立大会

随后,两套税务机构正式组建,人员、财产、经费、办公用房正式分设,机构职能运作正式启动。

两套税务机构的职能及税收征管范围

两套税务机构组建确定后,各自的职能及其税收征管范围也随之明确。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政策规定:

连云港市国税局主要担负着为国家(中央)征收的税种并管理、检查这些税种征管职能以及地方政府赋予、交办的征管职能和任务。

具体征收管理的税种和业务有:1、增值税;2、消费税;3、进口产品消费税、增值税,直接对台贸易调节税(委托海关代征);4、铁道、各专业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5、中央企业所得税;6、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7、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8、证券交易税(未开征前先征收在上海、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的印花税);9、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项税收以及外籍人员(华侨、港澳台同胞)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按税种分别入中央库和地方库);10、出口产品退税的管理;11、集贸市场和个体户的各项税收(按种分别入中

央库和地方库);12、国家税务局征收的各项税收的滞补罚收入(按税种分别入中央库和地方库);13、按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属于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缴纳的入中央库,其他入地方库);14、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15、中央、地方政府委托代征代收的其他基金。

连云港市地方税务局担负着为各级地方政府征收地方性税收并管理、检查地方税种及地方政府赋予、交办的征管职能和任务。

具体征收管理的税种和业务有:1、营业税;2、个人所得税;3、土地增值税;4、城市维护建设税;5、车船使用税;6、房产税;7、屠宰税;8、资源税;9、城镇土地使用税;10、国家资产投资方面调节税;11、地方企业所得税(包括地方国有、集体、私营企业);12、印花税;13、筵席税;14、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15、按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政府委托征收的其他基金和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虽然对国、地税两套机构征管范围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根据笔者的经历,有些税种不一定在市国税部门得到全面征收。如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当时在我市就没有涉及具体征收工作;筵席税,当时在我市地税部门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开征。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税务机构征管范围和职能又不断发生了转变,如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已划归市国税部门征管了。

关于两套税务机构内设机构及人员划分问题

全市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后,双方立即设置了内设机构,并对人员分流情况作了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国家税务局系统内设机构。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为二级,即:市国家税务局、县国家税务局,均为一级局建制。市区分局,为市国家税务局的派出机构。税务所原则上按经济区划设置。对县城镇以及管户多、辖区范围广、收入任务大的城区,可设分局,所、分局均为市、县局的派出机构。

市国家税务局机关的内设机构:行政机构 11



个,暂时定 10 个,具体为:办公室、人事教育科、监察室(与纪检组合署办公)、税政一科、税政二科、涉外税务管理处(涉外税务分局)、计划财务科、征收管理科、进出口税收管理科、个体税收管理科。党群机构 1 个:机关党委。事业单位定为 2 个:税务事务所(苏瑞会计师事务所)、培训中心。直属行政机构暂定为 7 个:税务稽查局、直属分局、新浦分局、海州分局、连云分局、云台分局、开发区分局。

地方税务局系统内设机构。市地方税务局按行政区划设置,名称为市、县地方税务局。列为同级人民政府序列,为一级局建制。其基层分局和地方税务所,由各地根据税收工作实际情况设置,分别为市、县地方税务局的派出机构。

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内设机构:职能科室 10 个,暂定 8 个:办公室、人事教育科、监察科、营业税管理科、所得税管理科、地方税管理科、计划财务科、征收管理科。党级机构 1 个:机关党委(总支、党委纪检组)。直属行政机构 7 个:市地方税务局税务稽查局、直属分局、新浦分局、海州分局、连云分局、云台分局、开发区分局。

关于两税务机构人员划分问题。当时文件规定,为了保持税收工作的连续性和分税制后税收工作的正常开展,两个税务机构的人员主要从现有税务系统人员中分离组成。根据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收入任务,本着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原则,两个税务机构人员划分比例一般按 7:3 确定。县以上税务机关按业务分工成建制或所管业务划转,业务相同的,抽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到地方税务局组建新的职能机构。现有基层征收机构成建制划转,也可按业务和一定比例分开,现任各级税务局局长即为国家税务局局长,副局长的划分,现有副局长 3 名以下的可划分 1 名到地方税务局,3 名以上的可划分 1 至 2 名到地方税务局。离退休人员原则上划归国家税务局管理。待两套税务机构组建后,人员划分问题基本达到平稳过渡,离退休人员基本在国税系统。

关于市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的关系问题

当时,如何处理好、协调好刚刚分设的两套税

务机构工作关系问题,一度成为热点话题和必须要解决、明确的问题。对此,经过协商,并报经上级机关审批,确定各级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在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税收政策和制度下,业务上要相互交流,工作上要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共同推进依法治税。在执法过程中,涉及中央和地方双方利益时,应相互兼顾,首先保证中央利益的实现。在日常工作中,各级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要互通信息,按时相互提供税收计划和统计报表等资料。征管工作要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可定期召开协调会,解决双方遇到的配合问题。起初,有关数据可由各级国家税务局负责汇总上报。通过 20 年的运作,从笔者经历来看,双方工作上的配合、协作是比较和谐的。

两套税务机构征收税收的增长概况

自 1994 年 9 月份,我市两套税务机构组建以来,双方征收的税收均呈逐年增长态势。

国税收入增长简况:1994 年全市国税系统共征收各项税收 11.37 亿元(含未分设之前和海关代征),其中,国税部门直接征收 7.03 亿元;1995 年征收 8.85 亿元,其中国税部门直接征收 5.92 亿元;2014 年征收各项税收 122.46 亿元。2014 年比 1994 年、1995 年分别增收 111.09 亿元、113.61 亿元。

地税增长简况:1994 年全市地税系统共征收各项税收 2.28 亿元,1995 年征收各项税收 3.71 亿元;到 2014 年,征收各项税收 203 亿元,各项综合收入(含相关费)268.88 亿元。2014 年比 1994 年、1995 年分别增收 200.72 亿元、199.29 亿元。

20 年来,国、地税收入增长幅度之巨大,反映出我市经济发展的较快速度和良好状态。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国税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雾崖石城

胡维仁

雾崖石城,在朝阳南山大雾崖下,太白洞西畔山坡上。沿太白洞西侧山路向上攀登二里左右,山势显得陡峭险峻,巨崖壁立,因长年多在雾中,故当地群众一直称之为“大雾崖”。远望大雾崖,只见大雾崖东面崖下是一片缓坡,缓坡的北边、西边皆是悬崖深壑,其深莫测,在下欲上,难于登天。只有缓坡的东面,山坡不太陡,地势不太险,缓坡上有一道石墙,那就是雾崖石城。雾崖石城 1993 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被公布为江苏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雾崖石城北端,有 6 块巨石相叠,其形如一巨

龙头,眼、嘴、角,栩栩如生。从茶场门北西望更是惟妙惟肖,人称“龙头石”,连着石城,真若一条巨龙,向北昂首,欲去东海龙宫。雾崖石城西,有一高耸裸岩,东西长 12 米,南北宽近 5 米,高 7 米,形若一巨象,东部卜下有缝若象鼻,鼻卜两侧有岩穴似象眼,两边更垂有耳,下凹处似腿,人称象石,头东尾西。

顺着大雾崖东面的缓坡,沿着一条采茶人所走的山间羊肠小道上攀,昂首望,石城全部用巨石砌成,长约千米,宽约一米,高约三四米不等。城门已毁,成一缺口,由缺口入城里,芳草遍野,山风幽香而凉爽,野果繁多而诱人,有悦耳的鸟鸣,有叮咚的流泉,无丝竹之乱耳,无牵牍之劳形。坐一块青石上,立一棵古树下,吸一口新鲜空气,沁人心脾,尝一个山间野果,酸甜可口,真是一个安静而美好的地方。

石城的东南角,大雾崖下有一块巨大的裸岩,顶上有石刻,名曰“雾崖石城记”,乃朝阳老一辈诗人张学瀚(字百川)所作。虽是晚清物件,今已逾百年,可笔画清晰,句读可辨,共 708 字。内容是:

雾崖石城者,吾先祖即朴同知鉴堂公之所建也。

当咸丰辛酉之季,捻匪刘天福率贼数万,饮马东海。夏五月三十



绵延近千米的城墙



日,攻破凤凰城,都司石龙章阵亡,荼毒生民,蹂躏海疆。吾乡惊惧,扶老携幼,或匿深山,或逃异域,云昏昼伏,晷晷宵行,望乡关而不见者数月。

维时我先祖买舟东洋,以避乱焉。迨返乡国,已至八月中旬。选择大雾崖,三面峭壁摩霄,惟东一面可通人行,先祖出巨资,议筑石城。命学瀚父即补主簿才甫府君与大伯太学生全封公监工筑城:磊石一面,南北亘延三百余丈,高约丈余。据以为守,有当关莫开之势,并筑屋数十间。至同治元年正月而工告竣。乡里避乱,多迁于此。山色还青,人烟燎白,村落虽小,仿佛桃源之景象焉。先祖命学瀚二伯岁贡生宜臣公书“桃源”二字,颜其额,盖取避秦时乱之意也。

以先祖一己之私力,留此绝大建设,为百余年来纪念,增吾乡历史之荣光,里人迄今称之,均所谓智者也。先祖创之,学瀚守之,结庐其间,以作别墅。每当春夏之交,松杉绿屋,薜荔匝檐,盈窗草色,碧蔕襟裾。虽片影片光,辄有江南绿岸之思,不欲令倦仆锄去。门虽设尝昼掩,人迹罕至,绝无车马喧阗,乱我一窗午梦。主人居其中,兴至弄笔;笔倦展书,随意吟李杜诗,读韩苏文,以及周易、春秋、国策、史记诸书。读罢,从容步水滨,临流濯足,听龙潭飞瀑,便足涤我襟尘十斛。飘飘意远,移坐山巖,遥望北海茫茫,渔舟片帆,出没沙渚,与飞鹤数点,泛泛于烟波上下,回顾两峰鼎立,绝磴千叠,突兀现眉睫间,便觉心旷神怡。兴尽而返,夕阳西下,孤月东升,人影在山,如堕寒镜,取浊酒一壶,对影成三,颇得李青莲觞月之趣也。

无何金风满径,玉露盈阶,空庭对影,残树往来,或箕踞坐太白石上,游目四顾,黄花笑冷,红叶迎秋。仰听寒蝉咽鸣,林鸟争鸣,不减于两部鼓吹矣。

未几,湿云四垂,雪满溪桥,前山如睡,飞鸟欲堕。予冷然御风,不作慄慄神寒状,策蹇驴,问寒梅消息,向古松悬崖间,敲冰煮建茗,长幼咸集,相与剧谈,较古考槃硕人之窟,鹿门子孙之隐,殆不多让。

余乃慨然曰:“斯城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援笔而为之记。

张百川先牛,是张鉴堂的孙子,他性本爱山水,

喜诗文,在其《雾崖石城记》中,仿佛已将此城变成自己的别墅,“兴至弄笔,笔倦展书”。在此可以“吟李杜诗,读韩苏文”,也可以“望北海茫茫,渔舟片帆”,“听寒蝉咽鸣,林鸟争鸣”,还可以“取浊酒一壶,对影成三,颇得李青莲觞月之趣”,更可贵的是他具体记叙了石城的建筑年代,石城的建筑起因,建筑过程以及石城的内部景况等,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且至今保存完好,深受世人关注。

在他的“云台导游诗钞”中还有一篇《石城》,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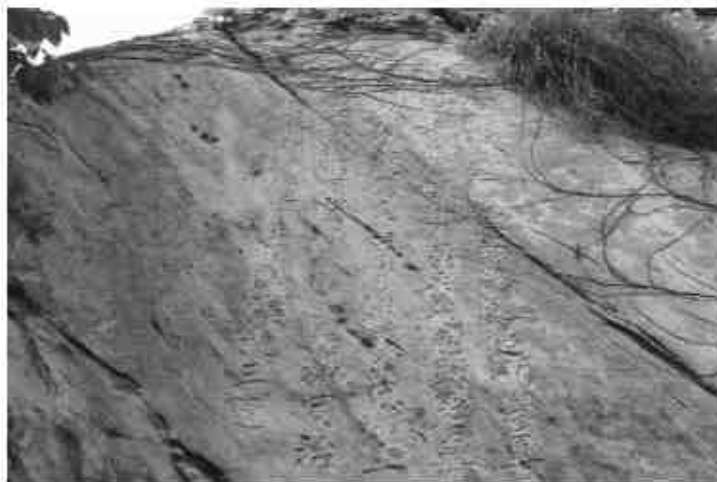
萧萧木落下林皋,三面悬崖万丈高。
百道泉飞层洞雨,满山松落半空涛。
不谙泉里樽前醉,可拟桃源世外逃。
此地定能秦火避,深藏岩壑乐陶陶。

原来咸丰辛酉年(1861年),农民起义军捻军刘天福部数万人饮马东海,农历五月三十日,攻破了凤凰城(即今连云港市南城镇),都司石龙章阵亡。捻军占领南城一带,云台山前后各乡的士绅都胆战心惊,坐立不安,有的躲藏深山,有的逃亡外地。居住在朝阳镇新县街的候补同知(官名)张鉴堂,深知朝阳离南城只有四十里路,起义军挥鞭一指便能拿下新县街,自然是万分惊恐,被吓得有家不能回,索性雇了船带了粮食,到东边的大海里躲避求安,一直到八月中旬捻军北上未回,才由海中回到家乡。

张鉴堂回到家乡后,仍然心有余悸,为了家族的安宁,就选择了在大雾崖下筑起一道石城,备枪炮,以防捻军回师骚扰。这大雾崖当时就是张鉴堂家的山场,三面是摩天入云的峭壁深壑,只东一面可以通行,只要在这一面筑起坚固的城墙,命人把守,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张鉴堂认为这是抵抗捻军的最理想场所。

张鉴堂命令大儿子张金封、三儿子张才甫监工,在这大雾崖下大兴土木,先砌起一道石城墙,高峻威然,坚不可摧,又在城里建造平房几十间,以供族人在这生活起居。城墙上还开一城门,门额上刻着“桃源”两个大字,取《桃花源记》中避秦乱的意思。这项工程到清朝同治元年正月才竣工,历时五月。





咏云台山大雾崖石城石刻



张撻三绝句石刻

石城竣工后,张鉴堂家族喜不自胜。他的三儿子张才甫作十言绝句,《咏云台山大雾崖石城》四首,刻在“雾崖石城记”石刻下面的另一块裸崖上,和《雾崖石城记》一样面天,诗曰:

峰峦四面不开门,鸡犬桑麻酒一樽。
此地避秦人不少,烟村仿佛小桃源。
岩岩鸟銜堠分明,三面悬崖一面平。
烟密何必思白下,此间也算石头城。
避兵何处走天涯,为访岩阿我住家。
幸有山城人不识,尘寰隔断古烟霞。
云冈台上石城连,路转峰回别有天。
访得幽人栖隐处,也如世外觅神仙。

字体隶书,字径10厘米,落款是“大清同治元

年二月新县村才甫张兼三题。”

在“雾崖石城记”的同一巨崖的北面也刻有十言绝句四首,该诗是张鉴堂的侄儿张撻三,偕友秦干堂清明游石城时有所感慨而写的。字迹仍可一一辨清:

天光时节雨清明,缓出芳郊我步行。
屈指几番春雨润,笑看一路野花迎。
鱼游溪水知多乐,鸟弄春声数不平。
坟际纸钱灰又起,双双蝴蝶爱风轻。
行几忘却路迢迢,风穿寻梅过野桥。
芳草梦回春不屈,杏花色到老天骄。
让开林碧来桃屋,爱染鞋青践麦苗。
岭上尽堪分石坐,指明同望海西潮。

为躲避捻军而建的石城,竟成了文人雅士休闲游乐的“公园”,在人们的传说中,这里曾是朝阳人心目里的“仿佛小桃源”“也算石头城”,人们大多来此观“鱼游溪水”,听“鸟弄春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消逝,雾崖石城里的房屋无人居住,皆自倾毁。但是石城墙依然像一条巨龙,纵卧山腰,令人叹其雄伟。

另外,在这三块石刻的西边不远的草丛中,还有一块裸岩,上面也有一块石刻,由西向东,共十行,楷书,字径10厘米。这是一块张学瀚偕众亲友游雾崖石城记事的石刻。内容是:

“当大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三日,表兄王朝纲,表弟张伦文,唐佐清,外甥张廷显,偕友心远,子良来访斯城,男正筠,堂弟恩沛,堂侄正其、正裴、正措、正授为导引以浏览。其际出前记以相映带,咸谓此景此情,有此文以写实境,不惟崖因文以表出之,人亦乐观文而识斯山真面目,为此勒石以告来兹,遂付工而镌之于大雾崖侧。”

落款“新县岁贡牛张学瀚字百川谨识,大村岁贡牛龔亭王仙纲书石”。

大雾崖石城的自然风光诗文石刻,文化底蕴很深,无怪往昔文人雅士的向往,当今休闲人士的羡慕。

(作者通联:市开发区朝阳街道尹宋村2-44号)

责任编辑 于冰洁



《连云港史志》

2015 年总目录

(总第 97 期—102 期)

本刊编辑部

特 载

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 努力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

——在全市史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苏中保(2-4)

在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滕 雯(3-4)

党有所需“史”有所为 开辟党史工作新境界

苏中保(3-7)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

日军侵占海州经过 蔡立志(1-4)

侵华日军对连云港地区渔业的残酷盘剥

张大强 李 彬(1-7)

秘密交通线上的秘密 王宗富(1-9)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一) 本刊编辑部(1-11)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滨海区 葛永明(2-11)

万毅避难西朱茆 王晓华(2-13)

云台山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上)

李 彬(2-16)

我父亲是侵华日军害死的 董桂芬(2-19)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二) 本刊编辑部(2-21)

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韩翠林(3-12)

丹心昭日月——记朱环烈士 王朝阳(3-16)

赣榆抗日战场上的巾帼英雄 葛 华(3-19)

前哨尖兵孙德林 孙苏林(3-22)

抗日“铁匠”李洪玉 唐其德 樊 振(3-24)

抗战时期的柘汪特别镇 祝新华(3-26)

云台山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中)

李 彬(3-28)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三) 本刊编辑部(3-31)

怀中利剑 袖中匕首

——赣榆武工队的战斗故事 葛 华(4-4)

鲜为人知的抗战书籍《血战敌后的——五师》

王晓华(4-9)



- 抗战时期的东海白河培训班 王宗富(4-12)
- 抗战时期赣榆县流通的货币 祝新华(4-14)
- 七十多年前的一场屠杀 张俊鹏(4-16)
- 云台山上的丰碑
——抗日石刻与连云港保卫战(下) 李彬(4-18)
-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四) 本刊编辑部(4-22)
- 海属抗战的地域特色 苏中保(5-4)
- 赣榆抗日战场上的草根英雄 葛华(5-9)
- 孙永钧:一位“四行”壮士的抗日人生 祝新华(5-13)
- 刘传铎:巧按地堡 将计就计 唐其德 樊振(5-16)
- 抗日老战士李长剑忆抗战 宋继奎(5-18)
- 黄窝村抗日记忆 胡可才(5-21)
-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五) 本刊编辑部(5-24)
- 刘少奇在山东根据地指导“双减”工作侧记 葛华(6-4)
- 罗荣桓打“狗” 王晓华(6-7)
- 两淮盐区抗日记忆 胡可明(6-9)
- 抗战初期首炸日军军火专列的爱国学者汪德熙 李思慧(6-12)
- 竹庭具抗日烈士张涛 祝新华 张作松(6-13)
-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六) 本刊编辑部(6-15)
- 郁洲溯源
- 连云港近代海岸线形成的历史过程 刘凤柱(1-14)
- 春秋补日看诸吴——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七 伏广喜(1-18)
- 也说“新浦” 韩世泳(2-30)
- 海浦观潮说水流——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八 伏广喜(2-33)
- 摩竺关中助刘备——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九 伏广喜(3-42)
- 贾圩百年巨变 韩世泳(4-28)
- 对《新安镇源流》一点考证 耿中太 韩翠林(4-31)
- 凌州曾是煎盐处——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 伏广喜(4-33)
- 山东庄里藏名洞——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一 伏广喜(5-32)
- 八朝古城所在地——城子村 孙铭(5-35)
- 王规祖孙在朱麻——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二 伏广喜(6-33)
- 志鉴论坛
- 浅谈资料处理与志书质量的融合性
——以二轮《灌南县志》续修为例 韩翠林(1-21)
- 谈《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编目设计 包宇 胡维敏(1-24)
- 浅析地方史志资料的开发与利用 贾栋钰(2-36)
- 连云港市发展红色旅游的资源分析与基本对策 徐亮(4-46)
- 读史评志
- 历史的真实 胜利的诗篇
——读《连云港抗战志》有感 蔡立志(5-26)
- 党史研究
- 刘瑞龙与同杨四农民暴动 何洪斌(3-33)
- 学习心得
- 编史修志以育人 鉴古知今以资政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



- 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于冰清(2-8)
- 历史与发展
- 连云港商品集散地和海运枢纽港历史地位的形成 刘凤桂(2-24)
- 情系新区那片土地 毛太奎(3-38)
- 抢抓机遇开掘涌榆河北调江水梦想终成真 张卫怀(4-24)
- 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共建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平台 刘成文(5-29)
- 往事追忆
- 1958年胡耀邦来我市接见共青团干部 许燕奎(1-28)
- 两访杨纯 许燕奎(2-27)
- 连云港市解放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张学贤(5-43)
- 报社生活琐忆 韩世泳(6-36)
- 国地税分设亲历记 殷然(6-40)
- 地方文化研究
- 中国出版史不可或缺的章节
——古海州的写种、刻印和出版 李洪甫(1-30)
- 海州智慧人物传说
——民间口头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崔月明(1-32)
- 中国古岩画艺术探析 李 晗(2-46)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一) 刘凤桂(4-36)
- “千岩万壑”绕鹤缘——记东磊一组石刻的人和事 刘洪雨(4-40)
- 谢元淮和他的《辞言》 彭 云(5-38)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二) 刘凤桂(5-40)
- 《西游记》与西游城——中华经典的呵护与彰显李 洪甫(6-19)
- 《镜花缘》传说:一部奇书产生的土壤 崔月明 刘兆元(6-23)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三) 刘凤桂(6-27)
- 人物春秋
- 毕生求真理 冰雪志更坚
——记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孙笃生 孙苏林(1-35)
- “循吏第一”——万历海州知州杨凤 张树庄(1-39)
- 抗日英雄胡文臣 黄正明(2-38)
- 刘明官与《大社的优越性》 张学贤(2-40)
- 孙金科和他58年的“反战情结” 祝新华(2-44)
- 史海钩沉
- 《悼陈若克同志》一文诞生始末 王晓华(1-41)
- 日伪时期的“海州第一棉场” 刘 阳(3-45)
- 洪门果园的古往今来 蔡立志(3-47)
-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胡可明(4-42)
- 沈云沛、袁世凯与清末邮传部 刘成文(6-30)
- 风物览胜
- 中云台山地区的地形地名与西游文化 蒋金明(1-45)
- 磨山史话 王宗富(5-46)
- 雾崖石城 胡维仁(6-43)

